

## 走出传统的稳定观

——孙立平访谈录

南方周末记者 陈敏

## 走出传统的稳定观

南方周末：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最近####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要坚定推进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但许多人似乎都有一个感觉，尽管社会上对改革有着热切的期望，现实对改革也有迫切的需求，但近些年改革的步子似乎不大，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孙立平：应当说，在过去若干年中，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有实质性的推进的。但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应当说推进是比较缓慢的。现在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事情，实际上是卡在这些问题上。我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体制，也包括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言论的开放和信息公开化，以及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和社会化的反腐败机制的形成等。换句话说，目前在改革的需求和改革的实际进程之间存在着一个较大反差。

这种反差来自什么地方？背后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与我们对社会矛盾的评估，对社会危机可能性的判断，与我们已经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有直接关系。为了不贻误时机地推进改革，也许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关于稳定问题的这种思维定势。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由于我们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过分严重，使得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凡是可能影响稳定的事情都要暂停；社会中哪怕鸡毛蒜皮的冲突和矛盾都要上升到稳定和安定团结的高度；在党和政府工作中，影响稳定成了无法担当的政治责任，在一般民众那里，稳定成为一种无需论证的话语。

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很快，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如果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市场经济也有好和坏之分的话，走向坏的市场经济的那些因素不但没有减弱，甚至有的方面在强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领域之外，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使得整个领导层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于是，出于稳定的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甚至连明确的思路也没有；比之 20 世纪 80 年代，思想和言论的活跃程度不但没有进展，甚至有局部倒退，舆论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由于不能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腐败在不断加大的打击力度下似乎更为猖獗；特殊利益集团的发育不能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其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已经达到有恃无恐的程度；一般民众利益表达的机制迟迟不能建立……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反应过度”是比较普遍

的现象。可以说，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经济的发展是迅速的，但经济的发展没有伴随相应的社会进步。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强调的，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贫富差距开始固化为一种社会结构，一种基本的利益格局开始定型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片面地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无法实施会触动基本利益格局的体制变革，在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上举步维艰，结果是社会中现有的利益格局日益稳固化。

从改革的角度来说，在传统的稳定思维之下，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被延误了。在改革的过程中，时机和顺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回过头去看，很多事情，20 世纪 80 年代做了也就做了。但在 80 年代的时候，我们会讲很多条件还不具备，能拖再拖一拖。实际上是把这个问题拖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更不好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当中，很多的状况是这样的。到时候你要付更大的成本，更大的代价。现在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你还会觉得现在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会有一些的困难，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假如说到了 10 年以后，也就是 2017 年的时候，甚至到 2012 年，五年之后，那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感觉，说这些事情还不如在 2007 年的时候做了，2007 年做这件事的条件可能比现在还要更有利一些。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思考稳定的问题，重新思考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要形成关于稳定问题的新思维，并在这个前提下，重建领导层的自信，

重建社会的自信，用坚定的自信来推进改革，造就社会的活力，实现新的阶段上新的社会发展目标。

稳定问题被泛化了

南方周末：遇到一件事情，随便一个人，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社会不能乱”。可以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稳定的思维定势已经渗透到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消除不稳定因素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孙立平：“社会不能乱”。如果孤立地看，这话当然没错，社会当然不能乱，社会乱了，经济不能发展，人民不能正常生活。但我要问的问题是，怎么就乱了？乱了的可能性有多大？更重要的是，那些具体的问题和社会####有什么关系？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要工资和“乱”究竟有什么关系？言论开放一点和“乱”究竟有什么关系？其实更多的情况下是我们自己吓唬自己，吓得不敢做事情了。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如何界定不稳定因素的。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包含“不稳定因素”这个关键词的网页，竟然有 500 万之多，当然这里包括许多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稳定问题毫不相关的网页，也有许多网页是重复的，但尽管如此，也可以看出“不稳定因素”这个词汇在我们社会中使用之广泛。失业下岗工人是不稳定因素，讨要被

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是不稳定因素，小区维权的居民是不稳定因素，房子被拆迁的居民是不稳定因素，被征地的农民是不稳定因素，城市中  
没有暂住证的流动人口是不稳定因素；近两年又说不能就业的大学生  
是不稳定因素，腐败是不稳定因素，贫富差距是不稳定因素，物价变  
动也是不稳定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是草木皆兵。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某县确定的“不稳定因素排查表”。这个排查表中列  
举的“不稳定因素”包括：因房地产交易、城镇房屋拆迁、建筑工程质  
量和工程款结算、物业管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地权、征地引发的  
不稳定因素；因涉农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劳动就业、基本生活  
保障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传销、制假售假等问题引发的不稳  
定因素；因集资、证券、储蓄、保险等金融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  
因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工  
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行政执法引发的不稳定  
因素；因司法工作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军转干部的问题、大中专学  
生就业安置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退伍、退役军人就业安置，自然灾  
害事故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教育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民族、  
宗教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的不稳定因  
素；因企业改制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食品、药品问题引发的不  
稳定因素；因防洪、建桥、水库开发影响群众生活、生产引发的不稳  
定因素；因安全生产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医疗问题引发的不稳  
定因素；因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其他问题  
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等。

从这个排查表中可以看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矛盾、一般的纠纷等等，都被当作“不稳定因素”了。当然不能否认一些问题处理得不好，会引发严重的问题，但一般地说，这些问题，而且是一个县里面的问题，其实与社会动荡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呢。

由于对不稳定因素估计过分严重，维护稳定，消除不稳定因素，也就成了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甚至首位的工作。久而久之，甚至逐步形成了一种有着固定套路的工作模式。一个流行的口号和做法，就是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各个地方采取的措施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地方设立“不稳定因素排查日”制度，乡镇甚至村都要制度化地排查不稳定因素；有的专门召开不稳定因素排摸会，对不稳定因素排查摸底。同时，稳定问题成了重中之重，在稳定的问题上宁左勿右。一到重要的日子，就如临大敌，严防死守。网络上的言论控制更是蛮横而随意，一些著名的论坛被迫关闭。还有的地方要求，“把不稳定因素排查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中统一考核，群防群治”。这样，把社会中一般的矛盾和问题与治安联系起来，就为用国家暴力手段对付不稳定因素打开了方便之门。其结果是，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僵硬的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甚至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方式。

在稳定问题上的泛化、扩大化趋势来自一种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在这种定势中，即使是控制过头了，尽管无益但至少是无害的。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撰文指出：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可能会带来种种问题。比如，为了稳定而安于现状，不是积极地解决社会中那些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捂住压制住；把稳定当

成了目的，为了稳定，公平和正义也要为之让路，甚至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均要以稳定作为标准；在有些地方，稳定甚至成了挡箭牌，明知事情做错了，却借口稳定不去纠正，反而用更多的错误掩饰前一个错误。由于过分的言论控制，正常的民意表达往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结果是社会中的矛盾不断积累。我记得，前两年就有一个帖子，题目就是《稳定什么也没有压倒，只是压倒了我们》，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更有甚者，一些腐败分子更是利用“稳定压倒一切”，压制民众对腐败的不满，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对腐败揭露者进行打击报复。有人激愤地说，“影响社会稳定”，有多少罪恶假借汝之名而行之？这话固然有点激愤，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大体也是事实。

应当说，无论在任何社会中，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都是必需的，没有基本的稳定，不要说发展，就是正常的社会生活也无法维持。但这里所说的稳定，是一种全局意义上，更多的是指基本的秩序和制度框架意义上的稳定，而不是将社会生活中任何细枝末节的矛盾都视之为稳定问题。而我们的实际情况却是，无论是居委会、村委会，甚至中小学都在将稳定作为自己工作的主题，将社会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都上升到政治社会稳定的高度，这是一种将稳定问题扩大化的表现。

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南方周末：稳定问题扩大化，涉及对我们社会不稳定问题的判断，您如何看待和评估我们当今社会的不稳定问题？

孙立平：客观地说，稳定压倒一切思维定势的形成，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原因是 1989 年的风波以及大约同时发生的苏东剧变。从此，对危机和不稳定的担心成为一片阴霾，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改革进入利益重新分配的时期，特别是由于某些扭曲改革机制的形成，某些改革措施实际上成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社会矛盾在不断增加或显现。于是，社会中也开始形成一种危机式思维。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一些危机理论不断提出来。我记得 2003 年的时候，就有研究报告说，10 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说得非常明确，明确地说还有七年。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到了 1989 年社会动荡的边缘。据我所知，这些学者也是好意，是想促使政府正视某些问题，尽快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这样的结论无疑强化了对危机可能性的过分估计。还有一个说法，即所谓 2000 美元~3000 美元是矛盾多发期的说法。其实在国际学术界这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说法。不错，在有的国家是存在类似的现象，但如果分析一下原因，就可以发现，那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民主和参与的要求就会增强。但在我国，近些年来尽管经济发展很快，类似的逻辑并没有出现。近些年一些社会矛盾的增多，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我们工作中某些失误造成的。有谁能够证明 2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就一定要大规模地拖欠农民



工工资？有谁能够证明 2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就一定用如此的方式进行征地拆迁？有谁能够证明 2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劳动者的权益就一定要受到严重损害？这些问题不就是我们近些年来引发社会矛盾的原因吗？这些问题是 2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阶段的必然现象还是我们工作的失误？在现实中，2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的说法，已经成为我们一些人掩饰失误的一块盾牌。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重新看待和认识与稳定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首先是对于社会稳定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对此，我一直讲三句话。第一句话，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话，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话，社会矛盾突出。经济持续增长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了余地，很多事情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还是经济萧条的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基本稳定是说，对于目前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人们基本是认同的。退一步说，尽管人们对其也有种种批评，也确实存在诸多弊端，但至少绝大多数人认同目前也只能如此。有了这两条，就足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同时也要承认社会矛盾是突出的，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现实，但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与特点，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不能视而不见，但也不能对其性质估计过分严重。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当中的大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基于这一点，我想能不能用秩序问题来代替稳定的问题，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新秩序。

在大约五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当前的社会矛盾确实是严重的，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实的社会

抗拒形式，可能不是民众造反，而是破坏社会治安。当时的基本结论是，社会基本稳定，利益矛盾或小规模冲突常规化，社会治安恶化。五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可以说这个判断大体是得到了印证。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确实在我们的社会中发生过许多矛盾或冲突，其中有的问题还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但这种挑战并不是可以对社会基本稳定构成威胁的挑战。比如失业的问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曾经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但经过 10 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危机基本顺利渡过了。从目前有关的研究来看，研究社会不稳定的基本思路是分析某些社会现象的结构变数与社会动荡的线性关系，而对其中的机制与逻辑缺乏足够的关注。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尽管有许多问题，有许多矛盾和冲突，而且也可以说有些问题和矛盾还是很严重的，如果处理不好也有酿成大的危机的可能性，比如腐败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还有下层群体的生存问题等等，但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我们强调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不是说要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而是说我们要准确判断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和概率，不能将危机的存在作为抱残守缺的理由。相反，一定要看到，各种因素现在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样宽松的环境是制度建设非常有利的时期，如果把握不住这个机会，就会贻误历史的机遇。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并不总是消极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就认为，社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就是说可以起到发泄或释放的

通道的作用。当然，谁也不会说，在一个社会中，社会矛盾和冲突越多越好，越激烈越好。但适度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它可以使问题更早地暴露出来，从而为更主动地解决问题赢得时间和机会。矛盾和冲突可以在一时之间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但引发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关键是我们的社会要为解决这些冲突做出制度化的安排，而不是自己吓唬自己。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吓唬自己，因为这会变成一种效应，一种社会心理学称之为的“自证预言”的效应。所谓“自证预言”(self fulfilling prophecy)，是指本来是错误的预言，但因为这个预言影响了后来的过程，结果本来是错误的预言最后得到了证实。稳定的问题就是如此。本来社会中有些问题和矛盾并没有那么严重，但由于把这些事情看得过分严重，该采取的有效解决措施不敢采取，使得能够解决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矛盾和问题日益积累，结果倒真的变得严重起来。

## 中国社会结构的弹性

南方周末：在我国的学者中，您是讲问题讲矛盾讲得比较多的一位，前些年还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贫富差距更是您关注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在这同时您还特别强调社会是基本稳定的，并且不同意过高估

计不稳定因素？

孙立平：为什么在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频发的今天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大？我觉得我们必须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这个重要但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因素。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的是，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这里所说的严重危机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大饥荒、60~7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80 年代末的社会动荡等。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但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过去有一个倾向，对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往往过分地高估，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的弹性往往过分低估。

仔细分析，这种弹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第一，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大饥荒为什么没有造成社会的严重动荡，更重要的是社会能在短时间迅速缓过来。这个因素现在也仍然存在。一个社会农村人口还占大多数的时候，是社会弹性比较大，有利于进行关键性制度建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放弃这个机会，一些事情要抢在人口基本城市化之前做。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不一样了，劳资冲突是面对资方的，小区维权是面对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连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涉及不到。在矛盾焦

点分散化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的共振效应是比较低的。

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和缓解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增多了机会。这些机会的增加，增强了社会自愈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一些哪怕是棘手的问题，余地和空间也要大得多。无论如何，一些事情的解决不能拖到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或放到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来做。

第四，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起码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政府的手中还拥有相当的资源，政府也具有调动和运用这些资源的能力。这种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这些用来救急，用来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

第五，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更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样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而且，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民众的理性化程度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理性化程度在增强。

第六，精英的联盟及其定型社会力量的形成。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体制对社会精英进行了成功的吸纳。社会精英之间的较稳定的联盟，使其具有一种定型社会的力量。尽管这种联盟会起到强化现有利益格局的作用，但其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种结构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是很难发生的。

第七，“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在这种市场主义话语中，金钱和财富

被视为最终的价值和标准，并将是否能够获得金钱与财富看做是个人能力的结果。在这样一种话语环境中，尽管一些人感受到社会的不公，但多将自己所处的不利境遇，看做是自己能力不济的结果。因此，尽管有人也会对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等现象不满，但最终是将其归因为“谁让咱没有权力呢”，即把导致社会不公的权力因素也归于个人的能力。这样一种话语环境无疑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不满和抗拒意识。

第八，改革开放的 30 年中，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虽然这个经验不能过分地高估，但政府在处理一些问题上还是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一点我们尤其不能忽视。

从这几个方面看，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稳定应当有足够的信心。矛盾和问题是存在的，但有两点，一是绝大多数问题不是威胁全局性稳定的问题，二是我们社会中应对这些问题的条件还是不错的。

## 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社会的冲突与矛盾

南方周末：但一个客观的现实是，社会矛盾确实是在增多，有人将我们现在称为矛盾的多发期，是有这些事实作为支撑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孙立平：上述判断并不意味着否认当今我们社会存在的种种社会矛盾

和社会冲突。近些年来，由贫富差别、腐败、征地拆迁、失业下岗、劳工权益等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不断增加，有的还有激化的趋势。这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甚至一些改革措施，比如教育、医疗、国企等方面的改革，也在引起新的矛盾，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问题是，面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是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把这些问题捂住压制住，还是通过制度创新为规范和解决这些问题创造制度性条件。

关键问题是如何对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定位。在最近几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往往是主要原因。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基本都是因利益问题引起的，或者说是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大约五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基本的判断，即中国开始进入利益和利益博弈的时代。这是我们理解上述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基本背景。现在我们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大体可以说，敌我矛盾是政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利益矛盾。而现在我们将其作为群体性事件加以防范和处理的，有相当一部分是正常的利益博弈。当我们将这些利益博弈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时候，正常的利益博弈中断了，能够及早暴露社会问题的机制被消灭了，结果是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试想，如果农民工在工资拖欠的问题上有和企业的正常博弈，有表达利益要求的制度化途径，如果农民工的抗议不是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何至于问题积累到前一段的程度？何至于要总理出面为农民工讨工资？

必须看到，准确定位冲突的性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多少年来，我们

往往将这样的冲突与矛盾人为地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其实，现在我们社会中许多矛盾和冲突的内容本身是很简单的，就是利益的问题，不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利益时代，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利益博弈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矛盾和冲突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演变成足以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是很少的。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设立规则，要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的方法。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制度容纳冲突和矛盾的问题。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曾经有几百万人上街反对布什的政策，但没有人会认为美国要大乱了。为什么我们在和平时期，几十个农民工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就会被看做是不稳定因素？关键是我们的制度容纳冲突的能力太低。因此，增强制度容纳冲突的能力，应当是我们制度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我们应当防止将一般的社会矛盾与威胁稳定的政治社会危机混为一谈。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社会动荡的讨论虽然有很多，但对社会动荡却缺乏明确而具体的界定。人们所说的社会动荡指的是什么，往往非常含糊不清。是指有组织的###？有一定规模的游行和示威？还是指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造反或非法暴力？我认为，正是由于将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混为一谈，才出现了将不稳定因素估计



过重的现象。

为了明确起见，我们在这里将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小规模、常规性的社会抗议。这主要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诸如####和小规模的游行示威等社会抗拒形式。这种社会抗议的特征，是发生在既有的体制框架之内，规模一般较小，而且一般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目标，其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很小。当然也要看到，我们现有的体制缺少处理频发的小规模常规性社会抗拒的安排，但这是我们的制度缺陷，不能成为将其夸大为不稳定因素的理由。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将其与社会动荡相联系，地方政府也往往要求将这类社会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局部性的社会抗议。这里所说的局部性有两层含义。第一，社会抗议的目标是单方面的；第二，这种社会抗议只是发生在某个局部的地区，如一个或几个城市。与前一种社会抗议相比，这种社会抗议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某种组织性因素的出现。同时，其影响也远较前者为大。更重要的是，目前的体制似乎完全没有处理此类社会抗议的安排。一般地说，这样的社会抗议事件也不一定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目标，但由于目前的体制似乎完全没有处理此类社会抗议的安排，因而政府对此类事件的敏感，往往高于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含义和敏感性。三是全社会规模的社会抗拒。这种社会抗拒事件是跨地区性的。这种社会抗议不仅会产生很强的组织因素，而且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秩序的冲击也最大。

人们一般所说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涵盖了上述几种不同的社会矛盾

或社会冲突类型。这是在分析社会动荡的时候必须注意的。然而我们注意到，目前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社会危机所进行的分析，很少注意到社会抗议的不同类型，甚至也不明确说明社会动荡的确切含义。这就往往容易将小规模、正常的社会冲突，特别是利益冲突夸大为不稳定因素。

## 坚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南方周末：坦率地说，所谓改革进展迟缓的问题，主要是指政治体制改革进展迟缓，对这个人们都感到棘手的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孙立平：在我们的社会中，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了，这是许多人共同的感觉。因为现在许多事情就卡在这儿。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入，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解决不同群体表达权和权利均衡的问题，利益关系就理不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对权力的社会化制约，腐败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就是从改革本身看，由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其他改革措施也往往走样变形。在改革论争中，我就曾经讲过这个问题，结果是许多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变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这样的情形不断重复之后，改革的共识在破裂，改革

的动力在丧失。

但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复杂而又困难的事情。对这样的改革采取慎重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慎重不等于不改革。在目前这样相对有利的时机下，稳妥而坚决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要选对突破口。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选择至少要考虑这样几点。第一点，不敏感。第二点，上下有动力。第三点，有潜力。

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我觉得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问题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 2007 年底到 2008 年初，我连续写了六七篇关于暗箱操作的文章。有人说，你怎么和暗箱操作干起来了，其实就是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考虑有关系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规范权力。暗箱操作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暗箱操作是现在我们政治行政体制的“癌症”。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词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了我们体制当中的很多弊端。对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对政府有效性的损害，对老百姓利益的侵犯，我们仔细去分析，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和暗箱操作相联系的。

在现实生活中，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我们权力相当普遍的非正式运作方式。比如国企改革是暗箱操作，干部提拔是暗箱操作，征地拆迁是暗箱操作，司法行政是暗箱操作，招生录用是暗箱操作，甚至转移支付是暗箱操作，公共资源的使用与管理是暗箱操作。不久前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前几年的国企改革，还有许多腐败大案要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暗箱操作。所谓暗箱操作，就是对权力的不公开行使。原来

这个问题还简单一点。进入到利益时代事情就不一样了。在当今的情况下，权力的行使在许多情况下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我们似乎就可以说，涉及的利益越是重大，人们不公开使用权力的愿望就越强烈，所带来的后果也就会越严重。

将解决暗箱操作问题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好处在于上下都有动力。从上边来看，无数个下级机构，每个人都在那儿捣鼓暗箱操作，政府不可能政令畅通。上下有动力，合到一块有合力。而且，近些年来，我们在解决暗箱操作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推进。中央在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公开。2006 年底，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理念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机关如果拒绝公开信息，公民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可以想象，政务的公开，信息的透明化，将会从根本上压缩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间。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的试点工作在一些地方正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也在制定种种措施。比如，从 2005 年开始，河北省以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邯郸市政府为试点，大力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改革，依法清理行政权力项目，公开政务运作流程。在这项意义重大的改革中，一个人们以前闻所未闻的名词是“清理权力”，甚至公布市长权力清单，公开政务运行环节。一些地方已经在搞公示制度。比如武汉，一个机构上边来了人，吃多少、喝多少，有一套手续，费用要有一个清单，贴在局里的大厅里，贴七天。七天之后，内部互联网上挂着。当然这当中会有很多漏洞，但这无疑展示了

我们未来体制建设的方向。

但是，在解决暗箱操作的问题上，在政务公开、信息透明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重要的是，没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真正的政务公开和信息透明是不可能的。应当说，建立一种正常的言论和舆论生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举例来说，腐败问题是我们社会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们也处理了一些大案要案。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有哪些大案要案是我们的媒体揭露出来的？相反，都是结案之后才开始在媒体上加以披露。如果有点蛛丝马迹媒体就能穷追不舍，一些大案要案可能就没有发生的机会，一些腐败分子也就不会走到后来的地步。这说明我们的舆论生态是不健全的，结果是我们社会的肌体缺少一种不可缺少的免疫力。

用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市场经济

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

南方周末：前面也已经讲到了，近些年来您一直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和利益博弈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什么样特殊的要求？

孙立平：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

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其实，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无例外地存在这个因素。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因此，要防止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理顺社会中的利益关系，最基础的问题是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制度化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等。也就是说，要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而这当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就无从谈起。

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利益表达往往被看做是不稳定因素，压制利

益表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一位工人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在我们油田企业，“稳定压倒一切”被放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压倒一切的稳定工作就是不让工人说话，不让工人彼此联系，不让……当职工对于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企业重大提案有话要说而不得不走向上访道路的时候，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总是视之为洪水猛兽。他们对相关人员进行 24 小时严密监控，所有公交车一律停发；所有单位保安人员全体出动，日夜值班把守工厂大门；所有公安干警天不亮就紧急出动把守各个通向厂、局机关办公楼的要道路口，不叫漏过一个相关人员。如果哪个单位因为措施不力，出现了上访者，该单位分管领导就被免职（而在平时，免去任何一位领导干部都是非常困难的，干部一般都是只上不下，除非退休和发生意外情况），以此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对于职工稳定工作的充分重视。因此，每有职工意欲上访的风声，各级领导干部始终是如临大敌，诚惶诚恐。上访人员则往往要甘冒诸如减薪、下岗，直至开除厂籍的处罚威胁。除此之外，企业单位还对上访职工亲属实行类似“株连制”的连带责任攻势，以此动员亲属力量化解上访行动。

本来，职工上访是一种正当的公民权利行为，可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下，职工连要求对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而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鲜见。

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之所以成为一个敏感的概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往往将不同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集合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而现实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具体的，如农民的征地问题，城市

中的拆迁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体现的是具体利益关系，表达的是具体利益要求。如果利益表达的渠道畅通，解决利益矛盾的措施有效，这些冲突一般都不会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且，我们通过对一些利益表达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参与者自己也往往很自觉地努力将利益要求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十七大报告中肯定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权。这样的表达权，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才能建立起来。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在这样的体制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也是一个迫切的任务，因为如果这个过程过于滞后，利益关系的失衡将会越来越难以控制。

## 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1）

南方周末：在一次座谈会上，您提出要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秩序思维与稳定思维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秩序问题的重点又是什



么？

孙立平：从一般的意义上说，社会生活不能没有秩序。从特殊的意义上说，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 30 年，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新秩序。在前两年我就曾经说过，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面临四大主题，一个是发展，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公平，一个是秩序。

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发展和改革的问题已经破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并在体制改革上突破关键的瓶颈；公平的问题实际上是刚刚在破题；而秩序的问题则几乎是完全没有破题。在秩序的问题上，过去就是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了。现在的问题就是需要用一种新的关于秩序的思维来替代传统的稳定思维。稳定是被动的，秩序则是主动的；稳定是静态的，秩序则是动态的；稳定往往是与活力矛盾的，而秩序则是与活力兼容的。可以说，在新的发展阶段上，用新的思维重建社会秩序是社会建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

秩序涉及极为广泛的因素，比如法治就是秩序最重要的条件。但在这里我想更加强调的是基础秩序的重建。因为这个问题人们讲的比较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或者说心里完全没有这根弦。我这两年在讲一个概念，叫不可治理状态。目前我们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真正威胁秩序的，造成社会生活紊乱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腐败，一些腐败现象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为

什么一些腐败是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有据可查和无据可查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你发都发现不了你怎么治理？现在你看腐败都怎么暴露出来的？要么小偷偷了他们家，偷出来一个贪官；要么一个贪官被抓住，把别人给咬出来了，咬出来一个贪官；要么二奶没养好，二奶造反了；山东的段义和则是爆炸炸出来的一个贪官。也就是说，你靠正常的制度化的办法，已经没有办法发现这些腐败现象了。为什么呢？因为腐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高度隐秘的状态。过去我们说一件事情隐秘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现在的一些腐败行为已经是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你知我知。你怎么去发现？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基础没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每年都放狠话，叫加大打击力度，但在基础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你加大打击力度有什么用？

因此，对于这类目前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的问题，首先要使其进入可治理状态。怎么进入可治理状态？关键是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的建设。比如规范的现金管理。就这一个东西，事情解决大半了。如果我们有一个规范的现金管理，超过 5000 块钱的交易不允许现金结账，必须通过银行走账，事情就大不一样。为什么现在的腐败会天不知地不知？因为几十万的现金拎过去，没有任何记录，没有任何踪迹可查。如果有了规范的现金管理，事情就大不一样了。你可以腐败，但是 50 万现金拎过去没有可能了。你得想办法，要么你给他账号里打过去 50 万元，要么你给他办一张卡，要么你给他买个房，都行，但无论哪一种，都有记录可查，事情也就有可能进入可治理状态。

## 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2）

有一个例子。美国中情局的一个官员因消费大大高于收入，被怀疑出卖情报而受到秘密调查。调查人员通过对该官员个人银行账号中资金往来的调查，发现其收到来自非工资收入的款项，并且该款项是来自与某敌对国家有关的机构。而进一步调查显示该机构与该国间谍机关有关系。调查人员立即对该官员保管的情报进行监控和调查，最后揭露出一起出卖机密情报案。在证据面前，该中情局官员承认曾将自己保管的机密文件拷贝后出卖给某国间谍。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推测，如果没有相关的现金管理制度，没有政府对社会金融活动的有效监控，这个案子是否能被破获，是很难说的。

规范的现金管理在发达国家已经是普遍实行的制度，在已经进入计算机互联网的今天，技术上也没有什么难的。关键是你做不做。基础制度，规范的现金管理是一个，再比如说我们的账目管理、票据管理、收入记录等等，都是属于这种基础制度。这些基础制度就相当于我们城市中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路灯、管道、输电线路等。一个城市如果基础设施出了问题，这个城市就玩不转，社会也是如此。一个社会的基础制度出了问题，它的秩序就无法保障。可以说，我们现在许多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里。

我在《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一文中已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即“制度是如何失败的”。制度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更直接的是制度设计和安排本身的问题。但有的时候，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有人曾经将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措施与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措施进行比较，发现在一些领域中，我们的反腐败措施并不比西方国家更粗疏，相反，有的甚至更为复杂和严密。但问题在于就是不起作用，原因就是基础秩序的缺失。不仅反腐败的问题如此，有很多有效的规则，其本身都往往是很简单的，甚至是很粗疏的。正因为如此，有人到了西方国家后曾经感叹，在那里要钻制度的空子是太容易了。

为什么一些粗疏的制度能够有效运转而没人钻制度的空子而导致制度失效呢？下面的例子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有欧洲手机销售公司免费向消费者派发手机，目的当然是想赚取话费。按照规定，每人只能领取一个，但也没有繁杂的手续，签个字而已。有人问，会不会有人重复领取？被问到的当地居民，耸耸肩答道：这怎么可能？正是从这个答案中，我们明白了这个看似粗陋的规则何以不被人们钻空子，因为“这怎么可能”这个判断，包含着太多的东西：个人的尊严、名誉、诚信、遵守规则，甚至还包括不珍惜这些要在未来付出的代价等。可以说，没有这一切作为支撑，仅仅“签字即可”的规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效运作的。因此，基础秩序中道德秩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这里讨论的票据管理、现金管理、收入记录，还有尊严、诚信和道德

等，看起来好像互不搭界，但所有这一切却构成了一种社会生活得以运行的“基础秩序”，而种种社会制度的运作也是以此为条件的。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波兰尼曾经提出“嵌入性”这一重要概念，他指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一种理论脉络做进一步的扩展，即所有的制度都是嵌入于“基础秩序”之中的。制度是否有效，与这个“基础秩序”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有一个新的思维。我们要准确地来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来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既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特别不要宁左勿右。在这个前提下，增强我们的自信心，一方面形成柔性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形成体制对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容纳能力，形成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手段；另一方面，不能用这些冲突和矛盾自己吓唬自己，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包括适时推动一些关键环节的改革，而不是延误时机。

## 一 金融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1）

在面对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

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是由美国引起的，但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进一步说，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截至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金融产生严重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中的一些核心要素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大面积的房贷断供，没有明显的信贷链条的断裂，没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整个金融系统在正常运转。中国股市的大幅度下跌，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但两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股市在 2007 年 10 月跌势开始的时候，其时美国的次贷危机尽管已经发生，但其世界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还没有发生。

危机中“中国的经济问题”反倒是表现在另外的方面。

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换言之，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指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内部因素我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这就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本来正在酝酿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而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恰在此时，由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

经济衰退阻断了中国避免这场生产过剩危机的出口，从而引爆了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

明确以上问题的意义是：

第一，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具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特点。应当看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经济危机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危机，与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这场危机的原发地美国，危机发生前几乎没有任何生产过剩的迹象，相反倒是“消费过旺”。如果说这次危机中也存在生产过剩因素的话，这种过剩也是在世界经济整体的意义上存在的，是在危机的非原发地存在的（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寅吃卯粮”则使这种过剩维持了表面的平衡。就危机原发地美国本身而言，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之后，由于信贷紧缩，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恶化，才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美国大量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是建立在信用消费的基础上），而且尽管如此，直到目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到达一种很严重的程度，并不是其经济危机中的主要问题。而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则不一样。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一开始就是发生在实体经济的环节上，生产过剩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对于生产过剩危机形成的原因，特别是对其“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尽管人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但笔者倾向于认为，生产过剩危机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特有的现象。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打破了生活必需品时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性，扩大了产能的弹性，从而也就强化了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均衡的风险（《以重建社会

迈过经济大坎儿——孙立平谈 1930 年代美国大萧条启示》，2008 年 12 月 18 日《南方周末》）。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同今天的美国相近，不如说同历史上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更相近。

## 一 金融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2）

第二，原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引发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生产过剩危机。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所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既可以看做是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危机过程。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但正如此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过程那样，这个转型是相当艰难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已经全面转向耐用消费品，而同时该社会还形不成全面消费耐用消费品的条件，生产过剩危机就有可能形成。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现象，就是这种生产过剩危机的端倪（孙立平：《内需不足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 年 10 月号；《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收入《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不过，冷战结束后突然加速的全球化过程，特别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过程对“中国制造”的需求，缓解了这个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没有新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早在 2005 年就会进入传统市场经济式的生产过剩危机，新全球化使中国面临的危机得以迟缓，但也在被推迟后以更大的程度出现（徐以升、陈晓晨：《金融危机本质：美过度消费和中国生产过剩危机》，<http://www.sina.com.cn>, 2008 年 09 月 22 日 02:40《第一财经日报》）。

而这种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取决于许多可能的引爆因素。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 2004 年写就的《中国的大萧条》一文中就指出，以下几种情形可能会成为中国萧条的触发点：①一场世界范围的货币、银行或者衍生产品危机，②美国的一次衰退，③扼制通货膨胀的措施，④中国失去贸易盈余，还有，⑤一场石油供应危机（《佩佐夫的惊世预言：中国的大萧条》，2004 年 11 月 22 日《全球财经观察》）。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与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没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更多是一种引爆的关系，或者说是挤压金融泡沫和资产泡沫的过程演变为挤压中国生产过剩的过程（黄树东：《经济危机正在逼近中国——危机就潜伏在我们身边》，<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11890>）。

这是我们分析这次危机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前提，而对经济危机社会后果的讨论，也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的基础之上。

第三，生产过剩危机将会是我们今后不时面对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转型期的非常规发展过

程。但在 30 年后的今天，这种非常规发展过程将会逐步转变为一种常规的发展过程。在常规性发展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加以正视的。第一，中国有可能将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时代（燕山大讲堂第 22 期：许 小 年 《 迟 到 的 衰 退 》，[http://view news qq com/a/20081216/000051 htm](http://view.news.qq.com/a/20081216/000051.htm)），我们也许要习惯一位数的增长。当然，这种变化也许是在若干年之后。第二，生产过剩危机将可能周期性发作。西方发达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用了差不多 30 年才真正完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其间要解决消费信贷、城市化、中产阶层发育、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以为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不时爆发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有两种误解。一是以为这场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插曲，插曲总会过去，一旦插曲过去一切又可以恢复往常。二是以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来说，这次的危机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而且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这两种误解将会导致我们对今天和将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错误的判断。

## 二 危机的波浪式推进：危机波与冲击波（1）

就这次金融危机本身来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其犹如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而且，自 2008 年 10 月前后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层面的冲击和实体经济层面的冲击可能会交替而来。不过，这里我们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在这场危机原发地美国形成的危机波与对世界经济形成的冲击波并非一回事。而现在人们对于这两者往往是混为一谈，这可能会导致对一些问题的误判。

作为原发地的美国，这场金融危机至少已经经历了两波，人们现在预测的是，第三波会不会到来，以及何时到来。第一波开始于 2007 年 2 月，即通常所说的次贷危机。2007 年 4 月，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告破产。继之，美国次贷几乎整个行业崩溃，超过 20 家次贷供应商或是宣布破产，或是遭受巨额损失，或是寻求被收购。2008 年 9 月 7 日，美国政府出资 2000 亿美元接管“两房”。这标志次贷危机达到一个高峰。9 月 15 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同日，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至此，次贷危机已经转化为全面的金融危机。

第二波则始于 2008 年 9 月。美国次贷危机加深，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经济衰退的迹象出现。典型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通过 7000 亿美元救市计划以应对经济衰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陷入困境。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对钢铁的需求大幅下降，钢铁生产急剧下滑。这个过程发生得非常突然。前 9 个月，钢铁这个传统产业还似乎充满勃勃生机，生产率和利润都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全行业呈现近

年少见的繁荣景象。然而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及随后接连出现的全球经济放缓和衰退让钢铁工业迅速由巅峰滑落到谷底。美国钢铁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在 2008 年 8 月底，美国钢铁产量约为每周 210 万吨，而到 12 月底，这一数字已降至每周 102 万吨，减少了 50%（《金融风暴危及美国三大支柱产业之首钢铁业》，<http://news.163.com/09/0104/13/4UQLFNL50001121M.html>）。对于有可能到来的第三波冲击，目前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第三波的金融危机将发生在 2009 年的夏季。不过对于这一波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一波的冲击将主要来自信用卡危机的冲击，也有人认为会由垃圾债券等因素导致。就其程度而言，甚至有人认为，这一波可能要比上两波的程度更为猛烈（宋鸿兵：《明年才是真正的“严冬”……》，<http://news.10jqka.com.cn/html/2008/12/20/293.shtml>）。如果金融危机真的会发生这第三波，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的范围和程度，可能就要重新进行评估。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波的金融危机可能不会发生。更乐观的说法是狭义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尽管金融危机在延续，但其核心区域已经转到实体经济，而非金融机构（<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81227/12175692956.shtml>）。经济评论家叶檀就认为：“金融机构确实面临着信贷违约率上升等风险，但有两大因素可以对冲这一风险。首先，工业贷款与个人信用贷款没有进行疯狂的资产证券化，泡沫与房贷相比，是大巫见小巫；其

次，奥巴马可以将剩余的救助资金，直接转向企业与消费者，以印钞隐性豁免债权的方式，直接修补企业与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http://yetan\\_blog\\_cnstock\\_com/.](http://yetan_blog_cnstock_com/)）。

## 二 危机的波浪式推进：危机波与冲击波（2）

对于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未来的走势，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争论，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的发作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与对外部的冲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一个趋势，越是到后来，这种差异就越大；越是到后来，受冲击国家受影响的实际过程，就会愈加取决于其内部的因素。换言之，越是到危机的后期，各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就越是受内部逻辑的支配，就越是“自己的问题”。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可以使我们看到，在危机原发地美国要解决的问题，与受冲击的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完全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第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沉重的，往往是金融体系最脆弱的国家，特别是虚拟经济比重比较大的国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冰岛。冰岛是个人口仅 32 万、国土面积 10 3 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冰岛曾长期跻身“世界最幸福国家”之列，多次被联合国评

为“最宜居国家”，其国民的人均收入也在全球前列。但冰岛也是全球内负债水平最高、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冰岛三大银行的资产规模总计达到 1280 亿美元，而其 2007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193.7 亿美元，银行业的资产总值高达该国 GDP 的 8 倍。同时，其外债超过 1383 亿美元，以冰岛 32 万人口计算，这大致相当于每位冰岛公民身负 37 万美元的债务。在亚洲，首当其冲的则是被称为“亚洲第一倒霉蛋”的韩国。从 2008 年 9 月底开始，韩国金融市场出现严重恐慌情绪，股市和汇市一路暴跌。但总起来说，在这一波冲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受到的影响较为有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认为中国甚或亚洲的经济发展已经与欧美等国家脱钩，在金融危机中可以置身事外。

但事实证明，当时几乎整个世界都低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威胁程度。当美国的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时候，其对外部的第二次冲击也就开始了。这第二波冲击主要是以影响实体经济的方式展开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日本和欧洲相继宣布进入经济衰退过程。美国 2008 年第三季度的情况显示：作为总需求主要构成部分的消费支出下降 %，GDP 负增长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economics/20081031/00175451336.shtml>）。由于金融紧缩，经济衰退，需求减少，进口大量缩减。在这一波中受打击最大的，无疑是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新兴市场。也正是在这一波中，中国开始明显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压力。尽管珠三角企业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发生的时间更早，但整体来说，珠三

角和长三角经济状况的恶化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但尽管如此，中国，包括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波中受到的主要还是外部的“冲击”。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第三波可能的冲击。尽管目前对在美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第三波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的看法是，即使原发地美国本身不发生金融危机的第三波，或者由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不会明显恶化，其危机对外部的第三波冲击也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波冲击也可以看做是前两波冲击在其他国家内部的再次回响，或者是危机在受冲击国家内部的发酵过程。在这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大的，可能将会是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最大的国家。可以想象的是，在主要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衰退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兴起，新兴市场国家内部问题以全球化解解决的空间缩小，内部经济结构的问题将会进一步突出出来。如果说在第二波冲击中中国就已经明确意识到不可能独善其身的话，那么，在这一波的冲击中，中国遇到的挑战会更有实质性。事实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一些过度借贷、盲目扩张和投资的企业就已经存在严重的隐患，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到来，这些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出现破产、倒闭。比如，2007年以亿元人民币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的张茵拥有的玖龙纸业据传陷于困境，就与其盲目扩张、债务沉重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这一时期将是内部结构问题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彻底显露的时期。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一波冲击发生的时候，也正是目前各国政府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效果开始显现的时候。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个明显

的特点，就是各国政府联手对危机进行干预，主要国家政府都出台了大手笔的救市措施。在短期内，这些措施对于防止危机的恶化，无疑会起到明显的作用，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下滑等。但同时必须看到，这些措施中的许多是仓促出台的，在缓一时之急后其某些消极效果会逐步暴露出来；一些措施只是使问题的爆发推后了，或减缓了，而不是解决了，过一段时间，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消解金融危机，特别是无法消解实体经济危机。因此可以想见，在一些最初的应对措施潜力释放完毕之后，造成这些危机的那些因素还会浮现出来。甚至目前的一些应对措施也可能正在埋下未来的隐患。正因为如此，像克鲁格曼这样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提醒人们，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日本式的长期经济低迷期。在一些国家，急风暴雨式的金融危机可能演变为一种慢性病。危机波与冲击波的差异，会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这次危机最后会不会导致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即作为原发地的美国在经济上所受到的实质性损失并不大，甚至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而处在危机边缘的国家，反而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但对于相关国家的发展，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 三 危机的传导过程及其机制（1）



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转变为经济危机之后，人们就在不断探寻这样的问题：危机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危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 20 世纪 30 年代那样的大萧条？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危机的传导过程及其机制。

从理论上来说，完整的危机要经过两步的传导过程。

一个是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在美国，金融危机肇端于 2007 年春季，而演变为经济危机则是 2008 年秋季。也就是说，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用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2008 年 10 月 3 日，美国国会通过 7000 亿美元救市方案，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金融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可能性。11 月底，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经济危机。接着，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宣布濒临破产边缘，更标志这个传导过程的发生。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明显的经济衰退过程。

另一个传导则是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金融危机引发社会方面的问题，并最终演变为社会危机，是在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当然这不是说，在纯粹金融危机的阶段就不会产生社会问题。但在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前，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国会第一次表决 7000 亿美元救市计划的时候，特别是之前，很多人还是把当时的金融危机仅仅看做是华尔街的事情。只有当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的前景已经明朗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危机才会发生。

产生两个传导的因素是完全不同的。导致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因素，最主要的是金融系统不能正常运作而导致的资金链的断裂。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之所以陷入困境，中国的一些中小企业之所以会破产倒闭，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资金链的断裂（需求不足则是背后更深刻的原因）。而导致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的最直接的因素，则是企业倒闭、裁员所引致的失业问题。正因为如此，失业问题往往成为在经济危机中各国政府要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因为失业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结果就是贫困、生活无着、社会矛盾等现象的发生。同时，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意味着社会中的购买力会进一步下降，需求不足的问题会进一步严重，人们对于前景的预期也会恶化。

明确危机的两步传导过程，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这场金融危机中的一些问题，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

首先，是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问题的独特性。美国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源发地，因此，美国必然要经历一个完整的危机两步传导过程。但尽管如此，美国在这次危机中所遭遇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金融的层面以及金融影响实体经济方面的。美国的问题主要是在这里。这不是说在美国，经济危机就不会传导到社会的层面，失业问题也会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比如，如果通用汽车公司真的破产了，不仅会涉及公司本身 12 万工人的饭碗，还会影响相关产业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就业。但尽管如此，有两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由于美国特有的产业结构，即使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实体经济的

危机，其就业问题并没有传统经济危机中那样严重。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很有限，而且所涉及的主要是非美、非欧籍职员。第二，美国的失业相对是比较好办的，因为它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 三 危机的传导过程及其机制（2）

而中国的问题却明显不同。如果说美国的危机是内源性的，那么中国的问题则是外致性的。中国经济问题的产生不是中国金融系统本身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而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的。而且，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不是直接冲击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本身，而是经由经济衰退冲击到中国的实体经济。更进一步说，正如吴敬琏先生早就指出的，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吴敬琏：《应对金融危机，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前面我也曾将这个问题概括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坎儿迈不过去。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直接发生在实体经济的层面。所以，中国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实体经济的层面以及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的传导。在最初的阶段上，首当其冲的是出口导向型企业。而在实体经济的问题深化之后，房地产、汽车和 IT 将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

行业。而且，这当中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就实体经济本身而言，中国国内可能会有一个内部地区间传导的过程。珠三角和长三角在这次危机中首当其冲，也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地区。但在短暂的混乱过后，这两个地区会将自己本来外销的产品转向内销。由于这两个地区原来工业的基础及其配套设施比较好，其在国内的竞争中会有明显的优势。可以预期的是，其他地区的经济可能会受到这些转向内销企业产品的冲击。

更进一步的，就是实体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如前所述，其中最核心的环节就是失业。特别是需要看到，在这个环节上，中国与美国相比是明显不同的。首先，中国的产业结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同样的经济减速，在中国产生的就业问题会比美国更为严重。第二，在中国受冲击最严重的产业中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根据有关部门的数字，在本地乡村工业中就业的农民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共有2—3亿人。即使是5%的失业率，也是一千多万人。第三，中国没有美国那种比较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极为不健全。因此，中国在社会层面遭遇的问题会比美国更为麻烦。由于缺少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失业问题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而且，近些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的是外出打工的收入，因此，大量农民工的失业会导致农民增收的困难，经济危机也会由此而导入农村。

其次，多次传导和反向传导将决定危机的深度。其实，前面所说的两个传导过程当然是理论上的。现实中的传导过程绝不会如此简单。这

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多次传导和反向传导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这次的金融危机有一个特点，即犹如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换言之，这次金融危机是逐级引爆的。到目前为止，明显的就已经有两波：第一波是 2007 年春季的次贷危机；第二波是 2008 年秋季的金融危机恶化及演变为实体经济危机。但问题是，当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实体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危机本身的过程还没有结束，还可能在继续引爆的过程中。这样就会出现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交替出现，而且是互相加强的现象。现在人们就在预测第三波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 三 危机的传导过程及其机制（3）

而更为值得关注的，则是危机的反向传导问题。因为反向传导将会导致恶性循环过程的发生。传导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传导是单向的还是循环的？如果是单向的，事情就比较简单。最麻烦的是在传导中恶性循环的出现。

反向传导主要会体现在两个环节上。首先，是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的危机，而实体经济的危机，如需求下降，企业利润降低，企业破产倒闭，再导致银行坏账

的产生，从而对金融体系形成新的冲击。在这当中，需要人们密切关注的是，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对其实体经济的影响究竟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就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会不会反过来进一步加重金融危机。最近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撰文指出，中期内国际金融市场还将持续动荡，由实体经济衰退带来的工业贷款、个人信用贷款违约率上升，可能引发第二波的金融危机(《中行副行长：金融危机可能来第二波》，<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115/23382630544.shtml>)。在我国，类似的问题也是存在的。应当说，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幸运之处，是自己的金融系统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无论是银行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还是政府债务，都处在可控状态。但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实体经济状况恶化导致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进入2009年之后，花旗银行等一些外资机构和一些大的投资者，在香港股票市场连续大量抛售中资银行股。其中的解释之一是，境外投资者担心内地转趋积极的货币政策，加上行政化干预，会很快导致国内银行坏账增加，银行盈利前景转坏。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

另外一个环节就是社会危机、社会问题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前面说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向社会传递主要是通过失业。而失业意味着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稳定的收入，结果是社会购买力的进一步下降，社会中贫困问题进一步严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恶化。这些结果的出现无疑会反过来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即购买力下降，需求进一步减少，生产过剩问题进一步严重。同时，人们收入的减少和预期的变坏，也会影响到金融的层面，收入的减少意味着偿还

债务能力的下降，意味着银行的坏账会增加，金融衍生品种的问题进一步加重。在中国，尤其要注意的是实体经济的危机向社会层面危机的传导。必须看到，西方已经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其构筑的社会安全网要比我们坚固得多。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新鲜事，我们几乎完全没有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经验，在制度层面上准备就更是不足。因此，在同样程度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我们在社会层面产生的问题将会更为严重，社会层面问题对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更加值得关注。

当然，实际传导过程的发生，不仅取决于危机本身演变的规律，也取决于人为的应对与干预。应当看到，与此前历次经济危机相比，这次金融危机中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在面对危机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在下半年甚至第二季度就有可能产生一定的结果。因此，上述的传导过程有可能不会完整地发生。但认识这些传导的过程，认识其机制和规律，对于我们深化对危机的认识是有益的。

#### 四 社会结构在危机中的重组（1）

经济危机是社会结构重组的过程，因为经济危机是一场消灭财富的战

争。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失败者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或者换句话说，是穷人和富人一起遭殃。但如果仔细分析，在经济危机中，不同阶层的人所受到的实际影响，却各有其特点。大体可以说，富人在财产上的损失最大，中产阶层在信心上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而穷人所面临的问题则最为突出。

由于经济危机是一场消灭财富的战争，富人的财富消失无疑是最快的。在“2008 胡润百富榜”上，统计显示，2008 年个人财富突破 100 亿元的有 50 位，比 2007 年少了 25 位，上榜富豪的平均财富为 30 亿元，比 2007 年下降 22%。其中，超过 50%的企业家财富呈下降状态，仅有不到 20%的企业家财富小幅上升。在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统计显示，拥有上市公司的房地产富豪在过去一年的财富平均缩水 60%，而非上市的房地产富豪的财富平均缩水 30%。在 2008 年财富减少最多的十大企业家中，有九位是房地产开发商，最为典型的是 2007 年排在富豪榜首位的杨惠妍，她的财富在过去一年缩水了近 75%，由 2007 年的 1300 亿元骤减到 2008 年的 330 亿元（[http://www nfdaily cn/china/shizheng/content/2008-10/07/content\\_4634818 htm.](http://www.nfdaily.cn/china/shizheng/content/2008-10/07/content_4634818.htm)）。据香港《大公报》报道，2008 年港股忽高忽低，曾有“亚洲股神”美誉的恒地主席李兆基除私人公司资产减少 1000 亿港元，旗下上市公司市值亦蒸发 1742 亿港元；李嘉诚持有的公司市值缩水更达 3900 亿港元。连同新地郭氏家族及新世界，四大富豪的公司足足蒸发近万亿港元市值（[http://finance sina com cn/g/20081230/08385700821.shtml.](http://finance.sina.com.cn/g/20081230/08385700821.shtml)）。



穷人在危机中的状况则呈现另一种情景。2008 年 10 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穷人可能损失最大。他对穷人在金融危机中可能承受最严重损失表示忧虑。佐利克指出，2008 年以来已有一亿人陷入贫穷，而这个数字还会持续增长，需要维持对穷人的经济援助（《世界银行总裁表示：金融危机穷人可能损失最大》，

<http://www>

[chinanews.com.cn/gj/gjzj/news/2008/10-13/1409456.shtml](http://www.chinanews.com.cn/gj/gjzj/news/2008/10-13/1409456.shtml)）。佐利克这里所说的穷人受损失最严重，当然指的不是其财富损失的绝对数，而是指其生活状况的恶化，其生存所受的直接威胁。联合国不久前表示，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2009 年人类历史上将首次出现多达 10 亿人因粮食短缺而挨饿。其原因是，随着粮食价格下跌，欧洲和北美的农民将会降低明年的粮食产量，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也会因为买不起种子和化肥降低产量。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美国国会公布的数字，在从 2008 年 10 月开始的财政年度，将有 2800 万美国人依赖政府发放的食品券购买生活必需品，这一数字是 20 世纪 60 年代实施食品券这一食品福利计划以来的最高数字（《美国 2800 万人靠食品券生活，媒体称经济危机将至》，

[http://news.china.com/zh\\_cn/international/1000/20080406/14768487](http://news.china.com/zh_cn/international/1000/20080406/14768487)

[html](http://news.china.com/zh_cn/international/1000/20080406/14768487.html)）。由于经济危机对穷人的影响往往意味着对其基本生存条件的威胁，因此，在危机中最关键的，是要保住穷人的生存底线。正因为如此，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中，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社会救济。而罗斯福新政中的社会救济，又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

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不仅保住穷人的生存底线，而且以特殊就业的形式给了他们一份信心和希望。

#### 四 社会结构在危机中的重组（2）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农民增收更加困难。据估计，目前农民收入的 40%~70%来自外出打工。据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对湖北省 3300 个农户的最新抽样调查显示，2005 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05 年度经济述评：多管齐下让农民富起来》，[http://www stats gov cn/tjfx/ztfx/2005sbnjjsp/t20060217\\_402305833 htm](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2005sbnjjsp/t20060217_402305833.htm)）。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返乡农民工增多，加上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粮价下跌，2009 年我国农民增收将会面临极大困难。二是城市中的失业群体。前面我们曾经指出，在这次危机导致的失业中，首当其冲的是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目前社会上对失业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这两部分人身上。但首当其冲的群体不见得是问题最突出的群体。因此，尽管农民工是危机中受失业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但其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农民工还有承包的土地。有人说，许多新一代的农民工连地都没有种

过。这是不错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种地相对来说是好学的。大学毕业生失业者的情况与之相类似，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没有结婚，失业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成为新的啃老族而已，或者是延续啃老的时间而已。可能问题最突出的，是城市中已经有工作经历而且又是已经成家的失业者。对于他们来说，失业即意味着最基本生存条件的丧失。其中，有的还承担着房贷等沉重的债务。对于这一部分人，也许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金融危机中，中产阶层所受打击往往是媒体关注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中产阶层在危机中发生的变化具有很强的戏剧性，而且也在于中产阶层本来就是引人注目的群体。而且，富人的变化可能是没有原来那么富了，穷人的变化是比原来更穷了，而中产阶层的变化可能是其在阶层间跌落。据洛杉矶媒体 2008 年年底的报道，随着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洛杉矶地区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大幅增加，许多中产阶级加入了无家可归者的队伍。报道说，因生意破产、失业等多种原因，一些律师、公司业主、实习医生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近来也成为无家可归者，目前只能靠政府救济为生。报道援引洛杉矶伯班克临时援助中心主任霍威尔的话说，在过去的 18 个月里，来中心求援的无家可归者增加了 66%，其中约一半人属中产阶层（《洛杉矶无家可归者大幅增加》，<http://news.sohu.com/20081028/n260277869.shtml>）。中产阶层在危机中所受打击最明显地表现在这样几点上。第一，财产性损失最大。住房的缩水，股市的亏损，承受的主体主要是中产阶层。第二，中产阶层债务沉重。在中产阶层中，其消费的耐用消费品，有相

当一部分是以信贷消费的方式实现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偿还这些债务对于其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不是问题。但在经济危机中，由于失业和减薪，债务将会成为部分中产阶层沉重的负担。第三，中产阶层在经济危机中的损失，除了财富之外，更重要的是信心的受挫。有人在网上说，现在过得最惨的就是中产阶层，因为富人早就有了房子和车子，穷人没钱买房子和股票，只有中产阶层，刚刚买了房子却成了房奴，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股票还被彻底套牢。

#### 四 社会结构在危机中的重组（3）

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对于缓慢形成中的中国中产阶层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有人说中国的股市一年就消灭了中产阶层，这话固然有点夸张，但也离事实不远。中央电视台对 76 万名投资者进行调查后说，92% 的股民亏损（[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7/14/content\\_8540627.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7/14/content_8540627.htm)）。这对其形成过程本身就异常艰难的中国中产阶层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实际上，过去几年中，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奴”也主要指这个群体。在近

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正在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逃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首当其冲。这里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一个社会在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时，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产阶层就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对于中国这样刚刚开始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国家来说，这个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金融危机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而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也会导致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剧烈调整。目前世界各国的救市措施或刺激经济增长措施，大多属于有人称之为的“第三方付款”模式。而由政府承担的“第三方付款”直接面对的就是政府财政的硬约束。解决这个约束的方式，无非三种，一是增加货币的投放，二是加大税收征收力度，三是发行债券。无论哪种方式，都会对社会中的利益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增加货币投放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增加税收会加大企业甚至个人的负担，而发行债券也等于向民间抽血（《周阳敏博士：4万亿扩大内需，到底谁是受益者·》，[http://sh\\_villachina.com/2008-11-13/2216983\\_2.htm](http://sh_villachina.com/2008-11-13/2216983_2.htm)）。而存贷款利率的大幅度下调，将严重损害存款人的利益而有利于贷款人。由于目前中国居民储蓄余额高达20万亿元，每下调一个点的利率，每年存款人将损失2000亿元。而资金使用过程中有可能导致的问题就更是不可忽视。

就经济刺激措施对社会中利益格局的影响而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以损害普通劳动者的权益来支持企业发展的倾向。前一段就有学者呼吁，要谨防假经济危机做空劳动者权益（[http://finance jrj com cn/2008/12/0100362921609.shtml](http://finance.jrj.com.cn/2008/12/0100362921609.shtml)）。应当说，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最近一段时间里，类似的消息不断传来，比如为了保企业，宣布暂缓执行新劳动合同法；为了保企业，一些地方宣布冻结最低工资；一些地方对劳动者争取自己权益的行动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压制措施等。而在另一方面，有关方面负责人则强调，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账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诸如此类的措施，对于解决危机中一些根本性问题来说，完全是南辕北辙。

## 五 失业是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关键因素...

200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半年度《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已经或接近于衰退”。报告预计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继续放缓，增长率只有3.9%；2009年将下降到3%，这将是2002年以来最低的年增长率（《全球金融危机下

的 中 国 经 济 应 对 》 ，  
<http://www.cass.net.cn/file/20081103202828.html>)。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则显示，全球失业率 2007 年为，预计 2008 年为，2009 年可能会高达（《全球萧条 2010 年有望回暖》，<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1230/03305699689.shtml>)。到 2009 年底，全球失业总人口可能上升至亿。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在日内瓦表示，根据该组织的评估，“到 2009 年年底，失业人口将从 2007 年的亿增加到亿”，这是“全球失业人口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亿关口”，也是 10 年来全球失业人数首次突破 2 亿人。索马维亚还指出，如果目前世界各国推出的救市措施不能迅速奏效，失业人口数量还可能进一步上升（<http://www.cbh.com/news/gc/2009/16/0916131359EA66B8JBH46HD17447I.html>）。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会不会传导到社会，会不会导致社会危机的发生？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失业。可以说，失业是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最基本链条。茅于軾先生说过，如果不是因为失业问题，经济危机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茅于軾：若没有失业，金融危机并不可怕》，[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811/19/t20081119\\_17428235](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811/19/t20081119_17428235.shtml)

[shtml](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811/19/t20081119_17428235.shtml))。在一次论坛上，有的学者对于就业问题甚至用了这样的说法，人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强调的是地段、地段、地段，而在经济危

机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就业、就业、就业。而失业问题在中国还有一层独特的含义。在前面我们曾经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金融危机引爆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实体经济的层面，特别是那些低端的、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就意味着，同样程度的经济问题，在中国引起的失业问题会更为严重。

金融危机中的失业问题是发生在我国就业压力本来就很大的背景下。数据显示，2009 年我国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 2400 万人。其中包括 1300 万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和 800 万下岗失业人员，此外还有 300 多万其他人员需要等待就业安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表明，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是官方数字的两倍（《中国城镇失业率攀升至，农民工失业问题凸显》，[http://news china com/zh\\_cn/domestic/945/20090105/15266794.html](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90105/15266794.html)）。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实际的失业率可能比上述数字更高。金融危机的冲击，无疑会为这种状况雪上加霜。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就业形势转差的两个最大的受害群体。2008 年 6 月以来，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农民工待业或返乡。实际上，沿海地区大量出口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前就开始了。其主要原因是美元下跌、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取消，尤其是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后，企业贷款紧张等。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发生后，形势进一步严峻化。有人估计，在 2008 年底，返乡农民工的数量有可能超过



1000 万人。此外，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问题。2009 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将达到 610 万，加上历年没有就业的人员，超过 700 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

## 五 失业是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关键因素...

白领或中产阶层的失业问题看似不如农民工那样集中，规模也不如前者大，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独特的位置，其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会更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领或中产阶层失业的特点之一，是其失业过程中造成的职位不稳定感和职业不安全感远远超过实际的失业状况，因此，这部分人失业带来的职业恐慌和信心危机，将会是更为严重的，并可能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提出两个分析性的概念，即“削底式裁员”与“削边式裁员”。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裁员中，发生的是“削底式裁员”还是“削边式裁员”，两者是有很区别的。所谓“削底式裁员”是指，被裁减的是底层的一线工人或下层职员。而“削边式裁员”则是指，不同层次的就业职位基本按照同样的比例裁员，在这种裁员中，高管和中层管理人员要和下层职员甚至一线工人同样面临失业的威胁。在一般的想象中，人们可能会觉得金融危机中的裁员或失业会

以削底式的方式进行，但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情况看，更可能是以削边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一个高层或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要相当于多个下层管理人员或一线工人的工资，裁减中高层管理人员能更有效地减少企业费用和工资成本，而且在底层人员被裁减之后，处于过剩状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被裁减就成为必然。2008 年底的一则报道题目就是《美国银行裁员之刀伸向高管》。报道说，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不久前裁减了约 20 位高层主管，其中包括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刘易斯(Kenneth Lewis)的一些长期拥护者。2008 年 11 月，汇丰银行宣布裁减亚太区 500 名员工，被裁减的员工分布于多个部门，亦涉及中、高层人员，包括月薪逾 10 万港元的经理级别的人员。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56%的企业高层预期来年裁员，47%的员工忧虑失业，25%的人开始翻阅招聘广告或更新自己的履历表，为可能面对的失业做准备（《美国裁员潮蔓延各行业，56%美企高层预期来年裁员》，<http://www.chinanews.com.cn/cj/gjcj/news/2008/10-19/1417084.shtml>）。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危机时期千万不要要求提薪，因为薪金高的人更容易被裁掉。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往往是整个企业整个企业地倒闭，在整个企业倒闭的过程中，无论哪个层面上的人都不可能幸免。

“削边式裁员”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逐级踢下效应”的形成。即一个位置较高的专业人员的失业，会导致逐级地向下顶替，当然这种顶替往往不是发生在企业内部，而是发生在企业之间，特别是不同层次的企业之间。这意味着一个上层的就业岗位的失去，可能会导致若干

个岗位上人员的更替。换言之，在这样的失业中，由失业造成的工作的不稳定性要远远大于失业本身，由此形成的工作不稳定性的预期会由此而大大放大。形象地说，最终就业位置每减少一个，可能会有十个人经历短暂失业或工作变动，一百个人产生工作的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的不安全感就会产生，甚至形成大范围扩散。与此相联系的就是社会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在中国，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因此，工作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

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个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保障就业，至少使失业问题不至于过分恶化。在中国政府不久前出台的系列性应对措施中，一个重要的考虑也是要解决就业问题。一般地说，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结构以及每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二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专家曾经根据各国人口构成的情况，以经济增长能保证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为依据，界定过各国经济衰退的临界点：中国 8%，印度 6%；其他发展中国家 3%~5%，欧美等发达国家 0%，人口老化严重，劳动力数量在减少的日本，轻度负增长不算衰退。在国内，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要保障在 8%以上，否则失业问题就会恶化。有一种说法，经济增长每下降 1%，就将增加约千万失业人群。因此，保增长就成为应对失业问题的最重要措施。

但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也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模式。有时后者的影响甚至更为重要。因此，8%

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关系。有数据显示，在不同产业部门增加边际投入 1 万元，能形成的就业机会是不一样的，商饮业可以带动就业 0.247 人，而包括金属制造、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等在内的重化工业都在 0.05 人以下。有经济学家认为，修一条地铁投资 50 亿元，能提供 2000 人就业就已经不错了。类似地，修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核电站这些都一样，都无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相反，加强对创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政策扶持则意味着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因此，如何将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的措施真正落实到扩大就业上来，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 六 社会矛盾会增加，但不太可能导致大的社会...

经济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或激化，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现象。因此，在历史上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中，总会伴随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动荡。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中，大量财富的消失、大面积的失业、生活的日益艰难、越来越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乃至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社会开始成为一个火药桶。其中很有名的就是美国退伍军人的抗议活动及由此引起的震荡。1932 年，大批参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退伍军人，为了获得退伍补偿金和工作机会，集聚在华盛顿，举行持续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抗议活动。虽然组织严明有序，不让激进分子参加，但依然遭到了胡佛命令的、麦克阿瑟亲自指挥、巴顿为先锋的军队的镇压。因为他们认为退伍军人的抗议有可能引起社会暴乱。武力镇压导致两名退伍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1933年3月退伍军人又陆续返回华盛顿。到了5月份，已有3000人住在为他们而设立的帐篷里。但这时候罗斯福总统已经就职，新政杠杆展开，他下令陆军将功补过，在华盛顿外围的一处旧军营里设立住所，让老兵住进去。第一夫人亲自前往营地视察，还向老兵们嘘寒问暖，共唱圣歌。1934年6月，老兵拿到了第一笔战争奖金。抗议事件总算和平解决。

2001年底，阿根廷由于债务问题出现了一场金融危机，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最终演变成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2001年12月19日，阿根廷爆发了10年来最大规模的暴乱，政府被迫宣布戒严，经济部长及总统相继辞职，随后两周内连换5任总统。

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危机原发地的美国大体太平无事，但欧洲却爆发了多次较为严重的社会冲突。2008年10月，希腊国营和私营企业的数百万工人举行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罢工使希腊的交通和公共服务受到严重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同年12月，希腊发生大规模骚乱。骚乱除了在希腊全国蔓延，而且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安情绪还波及欧洲其他国家，欧洲有年轻人甚至喊出了“欧洲革命”的口号。元旦前夜，在受金融危机首波冲击

最严重的冰岛，数百名示威者闯进总理召开的每年例行的常务会议会场，同警察发生殴斗，造成一名警员受伤，并对总理进行追打，向全国电视直播的会议被迫中断。有媒体分析希腊###的原因时认为，骚乱的发生与金融危机不无关系，“当国家经济每年保持 3%~4% 的增长率，社会弊端尚可粉饰掩盖，但当时至今日经济恶化，所有问题便像火山爆发”，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足以点燃街头火炬”（[http://military\\_china.com/zh\\_cn/critical3/27/20090113/15280897.html](http://military_china.com/zh_cn/critical3/27/20090113/15280897.html)）。

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无疑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但同时也有可能产生另一个倾向，即对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产生夸大性误判。在这种情况下，对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进行准确把握，并理性地处理此类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危机的转化，特别是失业的大面积发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趋势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但同时要看到，就总体而言，这次金融危机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国际上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六 社会矛盾会增加，但不太可能导致大的社会...

这当中首先一个值得重视的直接因素就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危机的应对，其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方式，不仅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即使与 1997 年金融风暴时候比也有明显区别。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各国政府基本是各自为战，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有的国家甚至以邻为壑。1997 年金融风暴发生时，冷战刚刚结束，各国政府协调性程度很低。而这一次则是各国政府联手，国际社会救市的速度非常快，也非常有力度，中国政府也积极参与了这次国际合作。加之有 1997 年处理金融风暴的经验教训，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比较有效的。尽管有时候政府的干预对于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功效有限，但对于缓解危机严重程度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其次，就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而言，已经远非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发生的那个时代能比。那时候，生活水平一降低就会威胁到基本生存，而现在即使是经济危机发生了，对人们生存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社会安全网络已经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有了质的区别。就此来看，金融危机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也需要考虑在内，即这次金融危机来源于外部，这种认识会提高人们对危机中一些问题的忍受程度。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内对群体性事件的警惕性明显增强，有人断言 2009 年将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年。但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可能引起社会矛盾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

面：一是股市或房地产崩盘造成的大规模财富消失；二是由于企业破产倒闭或裁员引发的失业下岗，导致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三是可能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社会动荡。但这些因素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其实际的结果还要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在2008年初，有经济学家就认为，若股市崩盘将引起一次大规模社会危机。还有学者不断提醒，如果中国房价急剧下跌，会引发社会大动荡。然而一年多的事实证明，在A股市场发生70%深幅下跌，股市市值蒸发掉20多万亿元（当然不全部是真金白银）的情况下，并没有引起导致社会动荡的事件，甚至连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也没有发生。失业问题对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影响要更为直接，前一段时间在珠三角地区由此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久前《财经》杂志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合作进行的百位经济学家调查显示，90%的经济学家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失业人数增加”（《2008年中国经济学家年终调查》，《财经》杂志2009年第2期）。但尽管如此，还需要看到如下几个因素的作用：第一，这次失业涉及的最主要群体是农民工；第二，大部分农民工失业后仍然有地可种；第三，失业后返乡的农民工是高度分散的，其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这不是说农民工失业问题不值得重视，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直接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而更多在于引发农民增收的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化。

值得警惕的倒是在有关调控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出现复苏的时



候，如果这时通货膨胀发生，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能会更为严重。各国政府在刺激经济时的大量投入，过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到时候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都有可能加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在前些年国企改制导致的大规模失业下岗浪潮中，社会动荡之所以没有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经济比较低迷，物价也比较低。当时我们曾有一个结论，飞涨的物价将会是压垮城市底层的“最后一根稻草”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205/20241353503.shtml>。）

。但通货膨胀导致社会动荡，必须是通货膨胀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货币大幅贬值。但在目前中国的产能已经全面过剩的情况下，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个因素无疑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因此，在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对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有清醒的头脑。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估计过于严重。在目前的情况下，尤其要防止的是后一种倾向。对于社会稳定问题，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对此，我一直讲三句话：第一句，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社会矛盾突出。经济持续增长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了余地，很多事情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还是经济萧条的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基本稳定是说，对于目前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人们基本是认同的。退一步说，尽管人们对其也有种种批评，也确实存在诸多的弊端，但至少绝大多数人认同目前也只能如此。同时也要承认社会矛盾是突出的，但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与特点，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概括地说，尽

管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会造成较大的冲击，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会增加，但即便如此，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社会治安有可能明显恶化。

## 七 重建信心是走出危机的关键（1）

在金融危机中，无论是源发地危机按照逻辑的深化和蔓延，还是对其他地方产生的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链条，就是对信心的摧毁。而且还可以说，在危机向外部产生冲击的过程中，信心的因素就占有一个更重要的地位。有人甚至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说，“全球金融危机除美国外，其他地区都是信心造成的”。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不准确的，但也说明信心这个因素在危机中的极端重要性。

经济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信心危机。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描述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这样写道：许多人从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李普曼当时就写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也不信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绝不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它不仅是一场在社会的经济层面上发生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发生在

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金融危机中信心的重要性在于，金融危机导致信心的下降，而信心的下降会进一步恶化危机。

危机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一种是实在的影响，一种是对人们预期的影响，最后可能会造成“自证预言”。“自证预言”是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先入为主的一个判断，无论它的准确性如何，都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个人接下来的认知和行为，最后使这个无因由的判断实现（〔美〕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2006）。通俗地说，一件事情可能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人们都把它当作这么回事，最后还真就成了这么回事。人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比如某银行本来是在正常经营，但在特定的背景下，人们传说这个银行经营不善，快要破产，如果不尽快提款，存款就要泡汤了。结果人们急急忙忙加入提款的行列，而银行也真的因为一时无法应付过于庞大的提款队伍而宣告破产。这个例子表明，由于市场是一种非组织化的人群所参与的场所，这种自证预言常常会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而对市场本身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市场中的行为往往受预期的支配。比如在股市中，牛市的预期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股民把更多的金钱投入进去，结果可能是使股市走牛。而当熊市的预期形成的时候，这种预期又可以使人们慌忙地逃离股市，从而造成股市大幅下跌。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自证预言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危机是一个互相感染的过程，这种互相感染最后甚至能成为左右危机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危机的走势取决于个人、企业、银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以预期为前提的。比如，个人对职业和收入

前景的预期会影响他的消费行为，企业对行业和市场前景的预期会影响其投资行为，银行对前景的预期会影响其对贷款的态度，等等。因此，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信心。1933年3月4日，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罗斯福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告诉美国人：“我坚决相信，我们唯一引为恐怖的只是恐怖本身。”###总理在谈到美国金融危机时曾说：“在金融危机袭来时，第一重要的是信心。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在2008年10月举行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总理指出，这次会议确定把应对金融危机作为主要议题具有现实意义，我对应对这场危机认为应当做的可以概括为六个字，那就是“信心、合作和责任”。所谓信心，就是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当尽快地采取果断措施，稳定金融市场，从而使人们获得信心。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措施，并初步见到了效果，但是现在看来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

## 七 重建信心是走出危机的关键（2）

在危机中重建人们的信心，首先要做的就是制止恐慌情绪的蔓延。经济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爆发往往是很突然的。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危机发生前没有任何预兆，学者们更可能在事后发现危机发生

前的种种蛛丝马迹。但尽管如此，危机的确认，往往是在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发生之后，比如人们往往称之为“黑色星期几”的股灾，比如著名的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倒闭，等等。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是 1929 年 10 月 24 日那场著名的股灾，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则是雷曼兄弟等金融机构的倒闭。在雷曼兄弟及美林等金融机构倒闭的最初一段时间，全球金融都出现了恐慌，许多国家股市暴跌，一批金融机构相继倒闭。如果这种恐慌不能得到及时的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幸运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救市计划，有效地制止了恐慌的蔓延。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共识开始形成，即尽管这场金融危机本身的情况相当严重，甚至有人认为可能不逊于 20 世纪 30 年代那场大萧条，但形成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那样的严重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危机中重建信心，不是说要粉饰太平，也不是对问题讳莫如深，更不是对有关的举措不能讨论争论；重建信心最关键的是要有重建信心的机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美国人信心的恢复是在罗斯福当选，而新政的那些政策还没有出台的时候。从中可以看到大选对于信心恢复的作用。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中国具有独特的信心资源。在中国，信心的拐点取决于政策信号。此种情况下对政策信号的要求不是多，不是狂轰滥炸，而是有效性。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应对危机。特别是 2008 年 11 月 9 日，中国推出了扩大内需的 10 项措施，确定了 4 万亿元人

民币经济刺激计划，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一些经济刺激措施，其实既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关于“4 万亿”发挥效应的时间，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的经济学家认为“4 万亿”发挥效应时间是 2009 年一季度，33%认为是 2009 年二季度，53%认为是 2009 年下半年，3%认为是 2010 年，只有 4%认为“作用不大”（《2008 年中国经济学家年终调查》，《财经》杂志 2009 年第 2 期）。这表明，至少在专家那里，中国经济的前景已经开始变得明朗。尽管这些经济刺激计划对于解决一些深层的问题还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有的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但对于危机中信心的恢复来说，其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在中国，股市的回暖将会是社会恢复信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技术的层面来看，中国的股市不但跌得早，而且是在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发生前就已经一步跌到位，现在已经有了触底反弹甚至反转的条件。其次，股市对经济的反应一般要提前半年左右的时间，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是 2009 年下半年甚至更早会出现回暖，因此股市的反弹甚至反转，具备经济条件的支撑。更重要的是，股市牵连到经济的许多方面，比如企业的融资功能，比如个人的消费行为。在这当中尤其是要看到，近一年多来中国股市的巨幅下跌，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就显得尤为突出。股市的回暖不仅可以使大量的现金解套，而且会改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因此，可以考虑将股市反弹，作为撬动信心恢复的一个杠杆。危机条件下信心的恢复还取决于社会和市场中的确定性。近些年来，

市场秩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毒奶事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造成中国的食品危机。市场的非规范化几乎毁掉了一个产业。在金融危机下，市场秩序恶化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最近网上的一个帖子讲道：我朋友是开电脑公司的，最近他接到一笔很大的订单，一家大公司要 50 台电脑，用在办公上。这家大公司的工厂有几千名工人，该公司开出的条件也很优厚，如果能接下来，可以说，利润相当丰厚，但是要电脑公司先供货，2 周后结算。朋友觉得现在生意难做，难得有这么大的订单，虽然有风险，但是觉得这么大一家公司，应该没有问题吧？就先发货给对方了，没想到，前天去该工厂查看时，发现那家公司的老板已经跑了，几千名工人 12 月的工资没有了着落，办公室门口还聚集了几十家供应商，都在催要货款。他提醒人们，如果大家所在的公司突然接到很大的订单，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楚，以免上当受骗！在他的帖子之后，很快就有一个跟帖，表示遇到类似的情况，并留下电子邮箱（[http://club\\_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3&id=2625857](http://club_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3&id=2625857)）。市场秩序恶化的结果，将会是交易成本的上升。这对市场信心的恢复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 八 危机中最重要的机遇是转变发展方式

在有关这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即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如何理解这个机遇？目前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趁机建立资源储备是一个机会；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空白，我们填补进去是一个机会。但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理解机遇的前提是理解挑战。这次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挑战，而且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对此也许没有人会有不同意见。但问题是，这种挑战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仅仅是国际上的经济衰退造成了我们出口的下滑？仅仅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许这场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最大挑战，是冲垮了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是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在新的背景下无法持续下去了。而这里说的无法持续，不是指在金融危机这样一种特定的背景下无法持续下去了，而是说，它标志着一种发展方式的终结。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面对这场危机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挑战加以应对，而忽视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不但会错过转变发展方式的大好机会，很可能会导致过去那种传统发展方式的回归。就此而言，可以说是短痛易止，长痛难消。

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转到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上来。解决内需问题在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面临的是内需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也是内需的问题。而内需问题，正如前



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是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以加大投资力度为主调的经济刺激措施可以在一时之内将GDP的增长速度拉动起来，可以将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甚至通过其他的努力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改善产品的性能，但假如东西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但如果不能通过社会变革解决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具备的基本社会条件，导致今天危机发生的一些深层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不能只是一般地谈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应当围绕内需问题来展开。内需是连接经济与社会的重要环节。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或隐或显地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和西方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衰退引起的，而金融危机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插曲，西方国家经济的回暖只是时间的问题；一旦西方的经济回暖了，我们过去那种发展模式不是又可以持续下去了吗？这个假设是存在问题的。首先，西方经济的回暖可能比人们预想的要慢；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给了西方社会一个很深的教训，在危机中和危机后，改变过去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将会渐成趋势；更重要的是，其实如果没有这场金融危机，我们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模式也已经快走到尽头。因此，趁着金融危机的压力，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但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折磨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至少10年的时间了。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

内需是启而不动、扩而不大。这表明，也许我们过去启动内需的思路有问题，真正阻碍内需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没有解决。内需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让老百姓花钱的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及罗斯福新政给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就是，要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通过相关社会制度的建设，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 参考文献

吉尔伯特·C 菲特、吉姆·E 里斯：《美国经济史》，司徒淳，方秉铸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解力夫：《身残志坚罗斯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莱维·巴特拉：《1990 年大萧条》，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

李庆余：《看美国如何构建社会和谐》，2006，  
<http://tieba.baidu.com/f/kz=147614468>。

李昉：《富兰克林·罗斯福》，《人物》杂志 2007 年第 2 期。

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孙立平：《内需不足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 年 10 月号。

孙立平：《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收入孙立平《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一 如何看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中的问题既不能说已经就是经济危机了，也不能说与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没有关系，因为很多问题确实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所以，我用加引号的中国经济问题来称呼中国在世界性经济危机背景下发生的问题。

如何看待目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首先取决于如何判断目前世界性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至少是有差异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就是由世界或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在对目前中国经济的讨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最多。第二种看法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出现问题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就持这种看法。他指的主要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旧的发展方式中的问题日积月累，即使没有这场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也会出现问题。其实还有第三种看法，即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这场世界金融危机并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中国有经济危机吗？不就是美国不买中国的东西了吗？这种观点的意思是说，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出口困难，而出口的困难与其说是这场金融危机

的影响，不如说是前一段错误的货币政策的结果，即人民币贬值的货币政策。

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这好像与上述第二种看法差不多，但具体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而内部因素我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不但是交织在一起，而且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思。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的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了。

我强调这两个因素的交织，一是为了表明，这可能使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面对的问题可能比简单面对金融危机更为复杂；二是为了表明，将这两个因素加以区别，注意到两个因素各自的逻辑，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这第二个因素，即国内因素，就是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问题及其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影响。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问题”，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尽管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与其说与美国今天的问题更相近，不

如说与历史上那些传统经济危机的问题更相近，或者说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候美国面对的问题更相近。换一个说法，尽管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全新的金融危机，但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最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

## 二 我们正遭遇跟当年大萧条一样的坎儿

对生活必需品时代和耐用消费品时代进行区分，并强调由前者向后者转型的重要性，对于理解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从而对于理解目前“中国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这样的话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无需再次重复。而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或当时利益关系失衡的关系，也是确凿无疑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另外一个问题：所谓产品过剩究竟是什么产品过剩？说东西卖不出去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而这个问题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少年来，“将牛奶倒在河里”几乎成了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只不过原来说牛奶是资本家倒的，

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垄断利润；而这些年有人查了当时的资料，发现牛奶原来是农民或农业工人倒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维持可以有利润的价格，至少是不愿意在赔本的情况下再赔上汽油钱将牛奶运到城里去。但不管怎么说，被倒掉的牛奶都成了大萧条或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符号或象征。然而，这样一个符号可能会产生误导，即人们将生产过剩与牛奶之类的产品卖不出去联系起来。换言之，就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而言，卖不出去的牛奶确实没什么代表性。

实际上，当时卖不出去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牛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包括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其他产品，如房子、汽车、摩托车、简易冰箱、洗衣机、收音机、电话等等，也就是耐用消费品。这些东西至少在当时是被人们当做耐用消费品的，那时拥有一台收音机的意义不亚于今天拥有一台电视机。当初，胡佛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许下一个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笑的诺言，他说，他要让“美国人家锅里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这就和我们当年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但“两只鸡”和“两辆汽车”却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鸡代表着柴米油盐这类生活必需品，汽车则代表着耐用消费品。锅里有两只鸡，家里有两辆车，形象地表明当时的美国和西方正处在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的阶段。这个转变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我查了一下材料，在 1929 年大萧条发生的当年，美国的汽车产量已经达到 500 多万辆。而我们 2007 年的汽车产量是 1300 万辆，国内的市场是 800 万辆。吉尔伯特·菲特和吉姆·里斯在《美国经济史》中写道：“住房营造在 1925 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

1929 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 50 万幢(1925 年约有 100 万幢)。1927 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菲特、里斯，1981）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正是美国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重要时期。无独有偶的是，房地产和汽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仍然是一对难兄难弟。

我国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开始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年纪大的人可能还记得，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假如夫妻两个每个人月收入 50 元左右，加在一块 100 元左右，用于购买柴米油盐的可能就得七八十元。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典型的柴米油盐时代，也就是典型的生活必需品时代。但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开始，我们逐步进入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转型的时期。不但各种耐用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且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在这个时候实现了大批量生产：开始是替代进口，接着开始成为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房改，住房成为耐用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家用轿车也开始大面积进入百姓生活。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 三 耐用消费品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必须说明的是，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进入这个时代之后，许多过去在经济中不存在的现象在这个时代出现了。

比如说，经济危机的发生。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生产过剩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带有很强的周期性。这种危机实际上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产物。在生活必需品时代，即柴米油盐时代，是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经济危机的。首先，除了偶然的自然灾害，柴米油盐这些产品的产量起伏不会太大，一般是呈缓慢上升的趋势，这与人口缓慢上升的因素大体能抵消。其次，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是刚性的，起伏也不会太大。对于生活必需品和人口之间的失衡，战争、瘟疫和自然灾害这“三把刀”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而耐用消费品时代就不一样了，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要更远一些，只要技术进步的条件具备了，新的耐用消费品品种的出现，产量的爆发式增长就有可能。这样，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就出现了。所以，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成为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常见现象。不过近些年来，由于福利资本主义的体制日益完善，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就如同这次由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就不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相反，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倒是由过度的消费引起的。

再比如说，消费信贷成为耐用消费品时代不可缺少的金融条件。耐用消费品的特征之一是，数量少，单价高。仅仅用当时的即时性收入往往不足以支付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支出，而是需要花掉过去的储蓄，甚至要提前用掉将来可能挣的钱。这样就需要信贷消费。如果没有消费



信贷的话，这个信贷消费就无法实现，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就非常困难。以美国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信贷消费就开始在美国广泛出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信贷消费的迅速发展，对汽车进入普通百姓家庭，从而对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消费信贷就是信贷消费的制度条件。所谓消费信贷，就是指金融机构为购买消费品的客户提供的一种信贷业务，它以消费者未来的购买力为放款基础，旨在通过信贷方式预支远期消费能力，来实现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同时，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后，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因为与生活必需品相比，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国民经济体系大大复杂化了，其信号系统也更加复杂和间接。整个经济体系的整合出现了更高的要求。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尔曾经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他主要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讨论风险社会，但实际上，人类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形成风险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正是由于这一点，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不同于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过渡的过程就开始了。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大危机。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 四 迈不过坎儿是因为背后的畸形社会

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所以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就是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结构和制度的支撑。如果形不成结构和制度支撑，这种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就无法完成。

这个条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结构性条件。至少有这么两点。第一点是一个社会城市化的程度。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至少需要一半的人定居到城市当中，成为城市居民。因为农村的生活方式是很难大量消费耐用消费品的。第二个是城市还需要形成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从制度性条件来说，首先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为什么社会保障成为必要？因为社会保障是支撑购买耐用消费品所必需的支付能力和信贷消费的制度条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美国的现代消费和消费信贷实际上就已经发展起来，但如果没有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支撑，这个制度是很难运转下去的。第二点就是常规化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说你的收入能够稳定，能够预期，而且在增长。

概括地说，城市化、福利资本主义、中产阶级、消费信贷等金融制度成为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四大支柱。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相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这个过渡就很难完成，结果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更严重的过剩危机的发生。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是在经济非常繁荣的背景下突然发生的。当人们使用大萧条这样的词汇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一幅晦暗的图景。实际上，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时间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期，20 年代甚至可以被称作“黄金十年”。以美国为例，1922~1929 年，被称为“柯立芝繁荣”，平均年 GNP 增长率高达 5—5%，失业率从“一战”前的 11%下降至 20 年代后期的 3—5%。19 世纪末发明的生产发电机、电话和汽车等技术，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已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收音机作为当时的一项重要耐用消费品，也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行业，到了 1929 年，1000 多万个家庭每家至少拥有了一台收音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霸主，就是在这 10 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的。

然而，危机以毫无征兆的极其突然的方式到来了。那么导致危机的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就是繁荣掩盖下的畸形社会。

美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avi Batra）在《1990 年大萧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今未被经济学家注意到的变数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 1929 年达到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他指出，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根据他的分析，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 年，美国 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 31—6%，

但到了 1929 年，即仅仅七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又上升到 36.3 %。按照他的分析，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莱维·巴特拉，1988）。而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的引爆作用。据这位经济学家估算，当时一个美国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 2000 美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 60% 以上的收入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威廉·曼彻斯特，1988）。可见，当时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不能持续，背后的原因是由于有一个畸形的社会。

## 五 罗斯福新政的实质

是以社会进步创造走出经济危机的条件

也许应该从这样的角度解读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罗斯福新政，包括当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所进行的社会变革。

罗斯福新政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体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实行所谓凯恩斯主义。在金融和整个经

济已处于崩溃状态的时候，出台一系列紧急措施稳定金融，重振经济。但更应当关注的是新政的第二阶段，它以社会变革为主要内容。有人将这个阶段实现的社会变革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联邦紧急救济署和工程振兴署的成立，使联邦失业救济成为半永久性的措施。第二，《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为工会的集体议价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框架。第三，《社会保险法案》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体系。第四，通过《税收法案》，恢复了再分配税体系。这其中，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通过工会规范劳资关系也许是三个更重要的方面。可以说，由这些措施构成的社会进步要比第一阶段那些经济上的应急措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们先看社会救济。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受打击最大的就是穷人。这一次也是如此，前些天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很多美国家庭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社会救济就成为当务之急。但必须注意到的是，这种社会救济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做不仅在危机中保住了底层的生存底线，而且为穷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再看规范劳资关系。当时的美国和我们今天一样，也是资强劳弱，劳工的收入很低。这也是当时的经济转不下去的直接原因。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其措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发挥工会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提出工会问题的是 1933 年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这个法案著名的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联邦政府保证工会有自组织及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换言之，发挥工会的作用是作为经济

振兴的措施之一提出来的。1935年通过的《全国劳动关系法案》更明确规定，雇员享有自发组织、建立、参加工会，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进行劳资谈判和参加其他各种旨在进行集体谈判或出于相互保护而进行的协商活动的权利。为了使工会真正发挥作用，该法律对一系列可能妨碍工会作用的行为，如歧视工会会员、收买工会等，明令予以禁止。

另一个重要措施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转引自李昀，2007）。于是就有1935年《社会保险法案》的通过。该法案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85美元的养老金。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解力夫，1994）至此之后，福利开始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项基本契约。

这与我们惯常的思路好像不一样。我们通常会觉得，社会保障是需要花钱的，总得是经济很繁荣，政府财政收入状况很好，政府手里的钱多得花不出去的时候才能搞社会保障吧？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企业本来已经很困难了，再有工会的作用和工人的斗争，企业岂不更为艰难？而且，在经济危机时，社会矛盾也比较激化，再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工会的作用，社会不就乱了吗？事实证明这些想法大错特错。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从时间上说是1929~1941年，1935年美国正处在

大萧条当中，经济状况很糟，政府财政收入的状况也很不好，而且罗斯福执政才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这时他急急忙忙搞社会保障，为什么？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让穷人渡过经济危机，而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社会保障使人们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才能解决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当时经济危机的主要问题。

通过工会的作用使得工人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博弈，美国社会不但没有乱，反而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最后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中产阶层是什么？中产阶层就是市场，耐用消费品的市场。这几项变革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一方面，它造就了一个中产阶层，同时给你一个社会保障，不用你担心将来养老的问题，也不用你担心将来看病的问题，你不但把现在的钱花了，把将来可能挣的钱也花了吧，这就是按揭或信贷消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社会变革的真正含义——就是通过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创造走出大萧条的条件。

不仅如此，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社会变革是重建了一种社会制度，重建了资本主义。历史学家汤因比回忆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说，那时“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认真思考与坦率谈论这样一个可能性，即西方社会的制度或许会垮台，再也行不通了”（转引自李庆余，2006）。可以说，此前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赤裸裸、血淋淋、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大萧条表明，这种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罗斯福新政开启的社会进步，等于重新塑造了一个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这个新的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今天，其潜力似乎还没有耗尽。

## 六 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更类似美国

###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

#### 面对的问题

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可以让我们看到社会变革与走出经济危机的关系。假如用上述的一些认识分析今天的金融危机，会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

前面我们说过，我们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遇到的问题，与其说与美国的这次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相近，不如说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遇到的问题更相近。其实，我前些年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如果与美国比，和它什么时候最相近？我最后的结论是，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之前的美国情况很相近。这种相近不是在那些表面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和那个时候的美国都在过同一个坎儿，即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但就是转不过去。这不是说中国也要发生 20 世纪 30 年代那种大萧条，而是说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在对目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全新的危机。无论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从引



爆它的因素来看，还是从它发生的逻辑顺序来看，这场金融危机与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不相同。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眼下这场金融危机就是以全球化为基本背景发生的，危机的发生地与所波及的地方，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在此前的传统经济危机中，各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是差不多的，往往是先出现经济危机，东西卖不出去，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再引爆金融危机。而现在这场经济危机则不一样，是金融危机引起经济危机，而且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并不一样。就此而言，认识这场金融危机的独特性是非常必要的。

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危机的总体性和全球性，也要看到危机在不同国家表现出的特点。这次危机在美国这个源头的表现和在我国的表现，很有点我们通常所说的阴阳的关系，你是阴他是阳，你是阳他是阴。从最表面的层面看，这场危机在美国是消费过度，并以过分膨胀的信用来支撑其过度的消费；在中国则是生产能力过剩，内部需求不足，消费不足。而这两者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关系。其结果是，危机在美国主要是表现在金融层面（当然也会影响到实体经济），而对中国来说，则更具有传统危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当然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同时，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美国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规范、消费模式的改变；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则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社会结构的调整、解决内需等。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看这个问题。借用刘世定教授“传导机

制”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危机的传导分为两个步骤。一个是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一个是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传导。这个传导的过程对两个社会的意义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美国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金融的层面以及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这个传导的核心环节就是资金链条的断裂。这不是说在美国，经济危机就不会传导到社会的层面，如失业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美国的失业相对是比较好办的，它有一个很好的社会安全网。而中国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实体经济的层面以及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的传导，其中核心的环节是失业。应当说，第一个传导已经实现了，就是说金融危机已经在演化为经济危机。2008年9月末10月初美国通过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就是一个标志。这中间有一个戏剧性的过程。2008年9月29号美国众议院以多数票否决了这个方案；不到一个星期，10月3号，又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个方案。前前后后差了将近60票。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政府对方案做了修改，但一些评论家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第一次否决之后，经过激烈辩论，人们对危机的认识发生了转变：这已经不纯粹是一场金融危机、股市危机、次贷危机，而是正在演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其结果是美国乃至世界严重的经济衰退。

实体经济层面的危机，以及实体经济层面的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是更需要我们警惕的。

##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1）

### 转变发展方式

在有关这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即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如何理解这个机遇？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上面我们说到，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出路，就是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从眼前来说是创造形成内需的社会条件，从而成功应对这场经济危机；从长远来说，则是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解决内需问题在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面临的是内需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也是内需的问题。你可以用加大投资保持 GDP 的增长，你可以将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你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但假如东西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要应对今天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激活内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条件。换言之，我们今天不能只是一般地谈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应当围绕内需问题来展开。内需是连接经济与社会的重要环节。

但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折磨我

们的社会已经有至少 10 年的时间了。在这 10 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内需是启而不动、扩而不大。这表明，也许我们过去启动内部的思路有问题，真正阻碍内需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没有解决。内需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让老百姓花钱的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及罗斯福新政给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就是，要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通过相关社会制度的建设，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由此揭开了美国政治史新的一页。但如果对比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中的总统大选，其实还可以发现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都是共和党的总统在执政。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中执政的是共和党的胡佛，甚至之前的几任总统也是共和党人，这次危机发生时是共和党的布什在执政。在危机开始后的大选中，又都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获胜，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中是罗斯福胜出，这次则是民主党的奥巴马当选。

这当中或许有偶然的因素，或许在危机发生时由一个政党取代另一个政党是势所必然。但不容否认的一点是，这两个政党的社会背景不同，其所代表的利益也明显不一样。共和党与社会的上层或大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民主党则更多是以中下层为背景。这次奥巴马竞选的口号就是，变革，我们需要变革，我们能够实现变革！这是一种怎样的变革？与其代表的社会背景不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联系到大萧条中罗斯福新政，我们就更不能无视这当中的区别。1932 年罗斯福在竞选总统的首次演讲中，就强烈指责胡佛的共和党政府，说政府专门救济大银行、大企业。他嘲笑那些“肤浅的思想家”，说他们不懂得怎样去帮助农民。他说：“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定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威廉·曼彻斯特，1988）而他在新政期间所进行的改革表明他并没有食言。

##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2）

其实，变革社会的真正困难之处也往往不在方案本身，而是如何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使得正确的方案和政策得以形成和执行。在这次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酝酿时间很长、社会呼声很大的减税让利的措施，不但姗姗来迟，而且只有区区 1200 亿元。相反，以投资刺激经济的计划，一出手就是 4 万亿元的大手笔，而且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地方政府迅速追加，据说现在已经达到 18 万亿元乃至 20 万亿元的规模。这当中的一冷一热，很值得人们深思。

当时罗斯福推行新政的时候有没有阻力？阻力大得很。但新政的成功

表明他克服了这种阻力。原因何在，大可玩味。

## 参考文献

吉尔伯特·C 菲特、吉姆·E 里斯，1981，《美国经济史》，司徒淳、方秉铸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解力夫，1994，《身残志坚罗斯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莱维·巴特拉，1988，《1990 年大萧条》，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李庆余，2006，《看美国如何构建社会和谐》，  
<http://tieba.baidu.com/f?kz=147614468>。

李昀，2007，《富兰克林·罗斯福》，《人物》杂志第 2 期。

威廉·曼彻斯特，1988，《光荣与梦想》，北京：商务印书馆。

## 普通人生活中的大萧条

## 普通人生活中的大萧条

### ——重读《光荣与梦想》（1）

金融危机，股市暴跌，许多企业陷入窘境，失业人数大量增加，诸如此类的字眼不时传来，一个令人恐惧的念头不时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一场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相仿佛的灾难正在到来？连历来说话谨慎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说，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所见到的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不久前，英国媒体以《美国 2008：经济大萧条》为题披露了：从 2008 年 10 月开始，有 2800 万美国人将不得不依赖食品券维持生活，这一

数字将打破食品券福利计划实行 40 多年来的最高纪录。英国媒体称，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面临经济危机的明确迹象。

对于这场危机，人们从经济层面已经谈论了许多，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对于普通人的生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时候，回顾一下有关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文献是有益的。1970 年，美国口述史学家史特凯尔出版了著名的《艰难时世：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史研究》(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一书。其中一个个案是饶有意味的。作者曾采访过一个名叫罗杰的人，在大萧条的时候罗杰年仅 14 岁。让人感兴趣的是，在特凯尔采访他之前，罗杰从未听说过“大萧条”这样一个词汇。他告诉采访者，他的父母和他周围的人在提到人们称之为“大萧条”的那段岁月时，所用的词汇都是“艰难时世”(hard times)，直到研究者采访他的时候，他们依然是这样称呼那段时光。这个例子告诉人们，同样是这样一场大萧条，在宏观的视野和微观的视野中，就社会的整体经历和就个人的个体经历而言，可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之后，人们出版了许多以个人的亲身经历撰写的对大萧条的感受，这些个人性的经历和感受与冷冰冰的宏观数字相比，展现出的是历史的不同层面，也使得我们有机会认识大萧条的另一副面孔。这当中有在大萧条初期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胡佛回忆录》的第 3 卷题目就是《大萧条：1929~1941》。在史学界，有美国米尔萨普斯学院的历史学教授麦克艾文的《大萧条：

1929~1941 年的美国》和《大萧条与新政：历史纪实》两书。在社会学界则有埃尔德的名著《大萧条的孩子们》。埃尔德用大量的个案和数据，证明了历史变迁对个人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只体现在个人的某个发展阶段，而是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中，埃尔德以 1920~1921 年出生组为跟踪研究对象，对大萧条经历对这些研究对象生命历程各方面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纵贯研究。埃尔德认为，大萧条不仅影响到研究对象幼年时的生活环境，而且对其成年后的工作生活、成人经历、职业生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波及研究对象的后代，并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二战”后美国人民的国民性格。而在这些纪实性的作品中，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记得在大学读书时我就曾被这本书吸引，而在今天重读这本书，又自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光荣与梦想》被称为一部“美国断代史”，它勾画了从 1932 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到 1972 年尼克松总统任期内发生水门事件 40 年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它描写的是历史性的大事件，但其着笔之处却细致入微。

##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3）



当人们使用大萧条这样的词汇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一幅晦暗的图景。当时一位替《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的人问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他回答说：“有的，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 400 年。”但实际上这个形象并不全面。实际上，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发生前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时间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时期，20 年代甚至可以被称为“黄金十年”。以美国为例，1922~1929 年，平均年 GNP 增长率高达 5—5%，失业率从“二战”前的 11%下降至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的 3—5%。19 世纪末发电机、电话和汽车等生产技术，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收音机作为当时的一项重要耐用消费品，也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行业。到了 1929 年，1000 多万个家庭每家至少拥有一台收音机。“消费者购买越来越多的新车，而且他们开始空前地使用电话。”房地产的价格在迅猛上升，股市经历了一个 10 年的大牛市，1926 年 3 月到 1929 年 10 月间，每股收益率上升了 2—2 倍。1929 年 3 月卸任的柯立芝总统就曾公开宣布：“股票在目前的价格上还是比较便宜的。”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美国到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1928 年，赫伯特·胡佛在他的总统竞选演说中自信地宣称：“我们美国即将在征服贫困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比历史上任何国家更伟大的胜利。不远的将来，在上帝的帮助下，贫困将在我国消失。”然而，危机以极其突然的方式到来了。1929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股市开盘后，股指循着前一天的走势，温和地上涨着，只是成交量明显地放大。到了大约 11 点的时候，股指才突然掉头向下，接着大幅

跳水，到了 11 点半，股市已经完全处于无法控制的狂跌状态。据说在一个小时内，就有 11 个知名的股民自杀身亡。偶然目睹这个场面的丘吉尔感叹道：“上帝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天啊！”从 1929 年 9 月到 1933 年 1 月间，道琼斯工业指数从 381 点跌至 36 点，缩水 90%。其中，道琼斯 30 种工业股票的价格从平均每股 364.9 美元跌落到 62.7 美元，20 种公用事业股票的平均价格从 141.9 美元跌到 28 美元，20 种铁路股票平均价格则从 180 美元跌到了 28.1 美元。到 1933 年底，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还达不到 1929 年的 1/3。在这期间，5000 多家银行倒闭，8 万多家企业破产，1400 万工人失业，几乎 4 个劳动力中就有 1 个处于失业状态。一个“黑色星期四”将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从巅峰抛向谷底。危机随之向欧洲，向整个世界蔓延。在茅盾先生的《子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危机也波及地处远东的上海。

金融危机是一场消灭财富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失败者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或者换句话说，是穷人和富人一起遭殃。曼彻斯特这样描述穷人的艰辛：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10 美分一包)；为了省电，改用 25 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朋友。如果说节衣缩食还仅仅是一种温和的表现形式，那么，被抛入失业大军的工人，破产的农民，

还有不计其数的露宿街头者，则成为这场经济危机的最悲惨的牺牲品。

##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4）

穷人陷入困顿，富人也大多不能幸免。之前在《福布斯》杂志上公布的美国 400 名最富的人中，有 38 人的名字从榜上抹去了。在一天的时间里，世界首富萨姆·沃尔顿就损失了 21 亿美元，丢掉了首富的位置。《光荣与梦想》记述了芝加哥一个叫做英萨尔的人。此人曾身兼 85 家公司的董事、65 家公司的董事长和 11 家公司的总经理。他掌管着 150 家公司，雇员达 5 万人。1932 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还在 30 亿元以上。但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 1931 年原价的 4% 了。英萨尔由 36 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 4 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 月，他因欠下 6000 万美元的债，逃往欧洲，最后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被押回本国受审。

这次的危机也同样如此。最近的一则消息是，《金融动荡雷曼公司破产总裁健身房遭暴打泄愤》。在这次危机中，拥有 158 年历史的美国

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国 CNBC 和著名杂志《名利场》不久前披露，雷曼总裁富尔德日前在公司健身房遭人挥拳打脸泄愤。最初爆出这件事的，是《名利场》的撰稿人沃德。沃德其后更承认，他不仅亲眼目击了事件，还有份上前打了富尔德。沃德说，在雷曼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的周日，富尔德来到雷曼大楼的健身房，“当时我身边有位仁兄怒上心头，走到富尔德跟前，向他狠狠挥拳”。他看到那人出手后，自己也忍不住走过去打了富尔德。沃德说：“我觉得他不知羞耻，他对不起那些基金及投资者，他从不承认自己的过错……我觉得他很傲慢可憎。”在中国，过去胡润百富榜是以 8 亿元财富作为入围门槛，但是 2008 年国内股市表现惨淡，富豪们资产缩水，因此 2008 榜单就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调低了入围门槛，从 8 亿元降至 7 亿元。同一则报道还说，超过一半企业家财富下降。从全国来看，2008 年 1000 位上榜企业家中平均财富为 30 亿元，比 2007 年下降 22%，超过 50%的企业家财富缩水；仅有不到 20%的企业家财富小幅上升。

在危机中消失的局部仅仅是财富，随财富一起消失的还有人们的意志与信念。正如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所说的，许多人从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李普曼当时就写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决不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它不仅是一场在社会的经济层面上发生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发

生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

谁种下了祸根？

谁种下了祸根？

——重读《光荣与梦想》（2）

当时胡佛总统的一句话成为后来人们不断提及的笑柄。对于伴随大萧条而来的贫困、饥饿甚至死亡，作为总统的胡佛似乎并没有切身感受到。一次他在接见记者的时候，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这样的话招来普遍的骂声是无疑的。

##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5）

但简单地说作为一国总统的胡佛漠视了灾难中人民的疾苦，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时至今日人们对作为一个大国总统的胡佛为什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也多少有点奇怪。真正的原因是那次的大危机确实有着某些诡异之处。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灾难突然来临的时候，类似这种幼稚的错误，绝非仅仅胡佛犯过。曼彻斯特说，那时社会中有着各种各样愚蠢的想法。其中之一是把产品的积压仅仅看做是一种销售

技巧的问题：“只要有哪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对于大萧条形成的原因，连当时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都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罢工，便是根本不想干。”

因此可以说，这些幼稚的错误，或者如曼彻斯特所说的那些愚蠢的想法和说法，与其说是由于幼稚和愚蠢，不如说是由于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中的惊慌失措。曼彻斯特的这样一个说法则是让人深思的：这两个历史时期（即凯恩斯所说的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和大萧条）至少有一点看来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

80 年的时间过去了，是谁种下了大萧条的祸根？人们仍在不断追问这个问题。总起来说，在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是两种最有影响力的解释。在凯恩斯主义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大萧条”，是由于社会中的总需求急剧下降。而导致总需求急剧下降的原因，则是由于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下降趋势、灵活偏好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所造成的，总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趋势使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而当时政府蹙脚的财政政策又使得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则将大萧条的祸根归咎于当时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 年》中指出，美联储防止银行破产努力的失败和从 1930 年底至 1933 年货币供给的下降，应对萧条负主要责任。

尽管其中的争论还会延续，真正的判断还要经济学家来做，但有一点推论是现在就很明确的：如果当时的大萧条是某些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失误的结果，那么，这样一场大危机就可以看做是政策失误的结果，换言之，这样的一场大萧条就是一个可以通过政策加以避免的事情。而事情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美国著名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avi Batra）在《1990 年大萧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今未被经济学家注意到的变数是什么？我的看法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 1929 年达到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他指出，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根据他的分析，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 年，美国 1% 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 31.6%，但到了 1929 年，即仅仅七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又上升到 36.3%。按照他的分析，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6）

而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发生的作用。据这位经济学家的估算，当时一个美国的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 2000 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 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对此，曼彻斯特评论道，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对当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那边是占 80%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一个俄克拉荷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的话，把恶性循环这个现象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这样的话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无需再次重复。而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或当时利益关系失衡的关系，也是确凿无疑的。但有一个问题很少有人进行讨论，这就是，说产品过剩究竟是什么产品过剩？说东西卖不出去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而这个问题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少年来，“将牛奶倒在河里”几乎成了大萧条的一个符号。只不过原来说牛奶是资本家倒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垄断利润。而这些年有人查了当时的资料，发现牛奶原来是农民或农业工人倒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维持



可以有利润的价格，至少是不愿意在赔本的情况下再赔上汽油钱将牛奶运到城里去。但不管怎么说，被倒掉的牛奶都成了大萧条或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符号或象征。然而，这样一个符号可能会产生误导，即人们将生产过剩与牛奶之类的产品卖不出去联系起来。

但实际上，当时卖不出去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牛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包括了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另外一些产品，如房子、汽车、收音机、电话等等，即耐用消费品，至少在当时是被人们当做耐用消费品的。那时拥有一架收音机的意义不亚于今天拥有一辆汽车。吉尔伯在《美国经济史》中写道：“住房营造在 1925 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 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五十万幢(1925 年约有一百万幢)。1927 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正是由于这一点，这次的大萧条不同于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是用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才渡过了这样一场危机；不但渡过了这场危机，而且由此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当初胡佛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许下一个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笑的诺言，他说，他要让“美国人家锅里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这就和我们当年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但“两只鸡”和“两辆汽车”却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鸡代表着柴米油盐这类生活必需品，汽车则代表着耐用消费品。锅里有两只鸡，家里有两辆车，形象地表明当时的美国和西方正处在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的阶段。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过渡的过程就开始了。人们

从直观上也许会觉得，过去是柴米油盐，现在是房子汽车，这不是很好吗？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实际上，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恰恰都是这看来美好的东西带来的。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大危机。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7）

这里关键是“消费模式”问题。在生活必需品和耐用消费品这两个时代，需要的消费模式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没有什么弹性，因为都是生活所必需的。而且生活必需品具有数量多单价低的特点，用来消费生活必需品的是即时收入。而耐用消费品往往有很强的选择性，而且耐用消费品往往数量少单价高，所以只靠即时收入来消费是不够的，往往既要动用储蓄又要动用将来的收入，即所谓的信贷消费。而要形成适合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就需要一些结构、制度条件的支撑，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相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这个过渡就很难完成，结果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更严重的过剩危机的发生。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罗斯福新政时期要进行那些社会变革，为什么必须以社会的全面转型来为走出危机创造条件；同时也

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应对危机的变革会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

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

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

——重读《光荣与梦想》（3）

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写道：谁也没想到，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在全国联播节目里突然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热情、洪亮、充满信心的声音。这位州长谴责胡佛政府，说政府专门救济大银行、大企业。他嘲笑那些“肤浅的思想家”，说他们不懂得怎样去帮助农民。他说：“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定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

这是罗斯福投入总统大选的第一次讲话。其后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罗斯福在大选中的胜利以及其执政后推行的罗斯福新政。我们知道，尽管后人对罗斯福新政也有种种批评和指责，但罗斯福新政将美国 and 西方世界带出了这场大萧条是人们所公认的。

这让人们想起这次的美国大选。在这次美国大选中，奥巴马获得了大选的胜利。对于奥巴马的胜利，人们更多关注的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由此开始了美国政治史新的一页。但如果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总统大选做一个对比，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都是共和党的总统在执政，30年代大萧条中执政的是共和党的胡佛，甚至之前的几任总统也是共和党人，这次危机发生时是共和党的小布什在执政；在危机开始后的大

选中，又都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获胜，在 30 年代大萧条中是罗斯福胜出，这次则是民主党的奥巴马当选。这当中或许有偶然的因素，或许在危机发生时由一个政党取代另一个政党是势所必然。但不容否认的一点是，这两个政党的社会背景不同，其所代表的利益也明显不一样。共和党与社会的上层或大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民主党则更多是以中下层为背景。这次奥巴马竞选的口号就是：“变革，我们需要变革，我们能够实现变革！”这是一种怎样的变革？与其代表的社会背景不是没有关系的。

罗斯福新政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上，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体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实行所谓凯恩斯主义。在金融和整个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状态的时候，出台一系列紧急措施稳定金融、重振经济当然是当务之急。讨论这方面的文献无以计数，在这里我们不再赘述。

##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8）

而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新政的第二阶段，而新政的第二阶段则以社会变革为主要内容。应当说，对美国的历史，从更宽泛的含义说对西方历史，有着更深远影响的是这些社会变革。有人将新政这个阶段实现

的社会变革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和工程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的成立，使联邦失业救济成为半永久性的措施。第二，《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为工会的集体议价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框架。第三，《社会保险法案》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体系。第四，通过《税收法案》，恢复了再分配税体系。这些措施基本都是 1935 年开始实施的，其中上述三个法案都是 1935 年同一年通过的。在这其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通过工会规范劳资关系也许是两个更重要的方面。

我们首先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天看来是一件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在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按照原来的传统，政府是不管国民的福利的。国家的任务是养兵打仗，保卫边疆，对内维持秩序，生老病死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但到这个时候，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流行的说法是，福利开始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项基本契约，个人的生老病死成为国家的事情。话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你给我福利，我服你管。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他甚至认为，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人们“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于是就有了 1935 年的《社会保险法案》的通过。

《社会保险法案》规定，凡年满 65 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 10~85 美元的养老金。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

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直到今天，许多人还有一种误解：社会保障是需要花钱的，总得是经济非常繁荣，政府财政收入状况很好，政府手里的钱多得花不出去的时候才能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从时间说是1929~1941年，1935年的时候美国正处在大萧条当中，经济的状况很不好，政府财政收入的状况也很不好，而且罗斯福执政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这时他就急急忙忙搞社会保障，为什么？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让穷人能渡过经济危机，而更重要的则是，只有通过社会保障使人们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才能解决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当时经济危机的主要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措施则是规范劳资关系。新政中一项重要的变革就是解决资强劳弱的问题。其措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发挥工会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工会问题的最初提出是在1933年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中，在这个法案著名的第七条第一款中规定，联邦政府保证工会有自组织及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换言之，发挥工会的作用是作为经济振兴的措施之一提出来的。在1935年通过的《全国劳动关系法案》中明确规定，雇员享有自发组织、建立、参加工会，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进行劳资谈判和参加其他各种旨在进行集体谈判或出于相互保护而进行的协商活动的权利。

##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9）

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工会的作用，法律禁止如下非法行为：①干涉、妨碍或压制雇员行使法定权利；②控制、干涉或在财务上收买工会；③为达到支持或反对工会成员的目的，在雇佣、解雇或其他条件上对雇员实行歧视对待；④对曾在该法案下提出过诉讼或提供证词的员工实行歧视对待；⑤拒绝与员工选出的代表进行诚实善意的谈判。该法案还规定成立一个劳资双方以外的第三方，即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负责执行该法的各项规定。

这个措施与时下的某些思路明显不同。在有些人看来，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企业本来就已经很困难了，再有工会的作用和工人的斗争，企业岂不更为艰难？而且，在经济危机时，经济状况本来就不好，社会矛盾也比较激化，再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工会的作用，社会不就乱了吗？但事实证明，美国社会不但没有乱，反而通过工会的作用和工人的斗争，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最后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就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而言，中产阶层是什么？中产阶层就是市场，耐用消费品的市场。

这两项变革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一方面，它造就了一个中产阶层，同时我给你一个社会保障，不用你担心将来养老的问题，也不用担心将来看病的问题，你把现在的钱花了吧，不但把现在的钱花了把将来

可能挣的钱也花了吧，这就是按揭或信贷消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社会变革的真正含义了：就是通过社会的变革、社会的改造和社会的进步，创造了走出大萧条的条件。

这样的社会变革不仅仅创造了走出大萧条的条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重造了一种社会制度，重造了资本主义。历史学家汤因比回忆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说，那时“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认真思考与坦率谈论这样一个可能性，即西方社会的制度或许会垮台，再也行不通了”。可以说，在这之前的资本主义是一种赤裸裸、血淋淋、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大萧条表明，这种资本主义已经走不下去了。由罗斯福新政开启的社会进步，等于重新塑造了一个资本主义，这个新的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今天，其潜力似乎还没有耗尽。

在改革与法西斯主义之间

在改革与法西斯主义之间

——重读《光荣与梦想》（4）

在回顾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历史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留意。在罗斯福就任总统前 3 个月，是德国的希特勒上台。当罗斯福紧锣密鼓地构想和颁布一系列旨在稳定金融和重振经济的政策的时候，希特勒则在一步步地构建一种极权主义的体制——制造国会纵火案，通过《授权法》，颁布《国家元首法》。其实，当时的世界上还不仅仅只有一个希特勒。

凡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承认，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与 30 年代大萧条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亚洲，



九一八事变就是发生在 1931 年，即大萧条发生的两年之后，日本由此走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欧洲和南美的情况也大体类似。有人进行过统计，到 1933 年 10 月，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法西斯运动遍及世界上 23 个国家，半年后增至 30 个国家。1920 年时，全世界原本约有 35 个国家拥有民选的立宪政体，到了 1938 年，只剩下 17 个国家了，到 1944 年，又减少到 12 个。

##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10）

现在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面对“大萧条”，为什么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并因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特别值得追问的是，应当说，美国在这次大萧条中受到的损失是最大的，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冲击也是最严重的，当时的社会矛盾也不能说不尖锐，为什么受冲击最大的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一些受到冲击没有美国严重的国家反倒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危机成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温床，是不难理解的。在严重的危机中，经济社会生活失控，社会政治矛盾尖锐，许多人处于绝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期待一种有着绝对权威的权力出来力挽狂澜，是一种很自然的要求。就此而言，当时的美国不是没有产生法西斯主义的

这种土壤。1933 年初，曾经创造了“柯立芝繁荣”的美国第 30 任总统柯立芝在死前 4 天哀叹道：“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罗斯福就职之日，卸任的胡佛曾送给新政府一句话：“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无能为力了。”连一向处世乐观的罗斯福，眼见马里兰银行倒闭时也惊呼道：“不知这座用纸板搭的房子会不会倒塌？”在大萧条发生那年的冬天，美国自杀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望笼罩着美国。

艰难的生活，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社会开始成为一个火药桶。马塞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 2000 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念叨：“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于是，抗税运动发生了，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有人未经主人许可就在别人的空地上种菜。在俄克拉荷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愤怒的情绪和失控的行为随处可见。

绝望开始演变为暴力。底特律的救济事业停顿了，随之而来的是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林肯市有 4000 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 5000 人占据了 10 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 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曼彻斯特写道：晒得黑黝黝的农民甚至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艾奥瓦州的农民在一个叫做雷诺的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的领导下，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

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被扔到玉米地里。这意味着人们在用武力来进行反抗了。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在 1933 年 1 月发出 12 个月内会爆发“农村革命”的警告。在面对普遍骚乱的时候，“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甚至那位把工人日工资从 2 美元提高到 5 美元，被人们称为“重新定义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老福特也在腰带上别上了手枪。

由社会矛盾导致的是激进的社会思潮和与激进思潮相联系的激进甚至暴力的行动。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曼彻斯特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在纽约，35000 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 42 岁名叫布登兹的激进分子率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成员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一位俄克拉荷马州人在国会作证时说，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对他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他问这位牧场主打算怎么干，牧场主回答说：“我们会得到 400 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

##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11）

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势力在明显抬头。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们就动手。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一个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朗格则在用实际行动建立独裁统治，取消州议会选举，州法院取消对制裁“侵犯公民自由”的宪法保证。法西斯主义无疑成为当时美国一个现实的选项。当时就曾经有人说，罗斯福当时如果想搞独裁，易如反掌。“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驾一切啊。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不但当时的美国人民，就是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也几乎心甘情愿地打算将等同于独裁者的大权奉送给罗斯福。

然而，罗斯福新政制止了美国社会动荡和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保

住了它的民主与自由。曼彻斯特写道：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在胡佛时期，他曾经试图以强硬的方式处理这些社会矛盾，但结果并不奏效，还曾经酿成臭名昭著的“补偿金屠杀”。镇压能够解决的是对政权的威胁，而不是导致威胁产生的危机本身。

在严重的危机和激化的社会矛盾面前，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意味着什么？有人会说，一个强有力的新政治家上台代表着一种新的希望；也有人会说，罗斯福政府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收到了效果。但问题是，所有这些法西斯主义都能提供，甚至会用更吸引人的方式提供。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使当时的美国避开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回答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美国为什么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也许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胜任的，但寻找罗斯福新政期间那些能制止法西斯主义的直接措施是可能的。事实上，在大萧条中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与其说是出于必然（这种必然性人们也经常“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样的题目下进行讨论，如著名的经济学家桑巴特），不如说是选择的结果。

而这种选择最重要的含义是对社会中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的缓解。在大萧条中受到冲击的是社会的各个阶层，焦虑和不满也散布在整个社会。但不同阶层具体的感受及形成的倾向和主张又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是在社会的两端，即大资本和社会的底层。大资本需要秩序以免使自己成为社会冲突的靶子，底层则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需要一个提供饭碗的人，哪怕这

个人是一个恶魔。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理解罗斯福新政期间的这样一种简单而明确的政策取向：抑制大资本，救济穷人。意味深长的是，胡佛时期偏向大资本的政策最后导致的是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满，而罗斯福倾向穷人的新政却为各阶层的焦虑提供了不同的出口，就连被抑制的对象大资本也因经济的稳定和复苏而燃起了新的希望。复苏的经济为大资本带来的利益显然加倍地补偿了对大资本的抑制，而穷人则在新政中获得了以制度保障的生活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关系新的均衡的形成，社会矛盾的逐步缓解，政权基础的稳固，使得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极端思想的市场大为缩小。

美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中的变革是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骨子里对自由的热爱，使人们哪怕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没有丧失最后的清醒，没有丧失对失去自由所带来的恶果的警惕。

## 一 暗箱操作——中国之癌（上）（1）

上海社保案的被查处，是中国社会中最令人震撼的事件之一。在上海原有的 100 亿元社保基金中，有 32 亿元被监管官员挪用，私自拆借给私营企业用于高速公路等行业的投资和收购。拔出萝卜带出泥，随

着社保案的浮出水面，包括原上海市委书记####在内的一批领导干部和企业家受到刑事、党纪政纪处分。

上海社保案对社会的震动，不仅仅在于涉及的金额高达几十亿元，也不仅仅在于这几十亿元是老百姓的保命钱，甚至也不仅仅在于涉案官员地位之高。上海社保案最让人关注之处是这样一个大案发生在上海，而上海历来被看做我国现代化水平最高、治理基础最好、管理也最为规范的一个城市。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当一些腐败大案被查处的消息频繁从各地传来的时候，上海仿佛成为一块净土；在权钱勾结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的现象时，上海仿佛成为唯一的例外。而上海社保案的发生，使得人们有机会来重新审视这当中过去一直处于被掩盖状态的问题。

在国企改革讨论中，曾有人将国有企业形象地比喻为不吃即化的冰棍。实际上，这种不吃即化的逻辑已经不仅仅存在于国有企业，在其他已经积聚起来的公共资源中，这种逻辑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保基金就是一例。社保基金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额大，年年积累下来的资金总量甚巨。截至 2005 年底，中国各项社保基金规模已超过 1 8 万亿元。二是社保资金的积累和支付不同步，时间跨度往往长达几十年。这两个特点不仅使得近年来违法违规使用、滥用社保基金甚至使之流入私人腰包的案件不断发生，而且使得这些违规行为更具隐蔽性。

据不完全统计，1998~2005 年，全国仅清理回收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就高达 160 多亿元，至于没有被清理回收的，没有发现的，究竟还有

多少，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但从几件有关的大案来看，社保基金被挪用甚至被鲸吞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2004年3月，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一起涉案数额巨大的社保基金挪用诈骗案，几名被告人共挪用社保基金7659万元，金融诈骗涉案金额近1.8亿元；2002年9月，因诈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2000万元，原海南达龙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泉润被判处死刑；2006年5月，河北省电力公司社保中心原基金管理员秦援非挪用3817万元社保基金炒股票，被廊坊市中级法院以挪用公款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6年上半年，又有一批此类案件被曝光，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是上海社保案。

仔细审视上海社保案，其中至少有三个因素特别值得重视。第一，缺乏监督，内部运作。从上海社保案来看，上百亿资金的保管和使用，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够掌握足够的有关信息，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监督，至于与之关系密切的一般公众更是连知情可能也没有。正因为如此，数十亿的资金可以被秘密拆借，并以此搭建起权钱交易的桥梁。第二，暗箱操作与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相结合。这里的暗箱操作，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权钱交易的老做法，而是在被挪用的资金与资金最终使用之间形成一个很长的链条，连接这些链条的就是现代资本市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这个链条中涉及官员、民营企业与国企老总等众多方面，展现出一幅“金融时代”官商勾结的新图景。第三，严密控制信息的败露。在2006年年初，曾有经济学家接到一些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举报上海福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张荣坤的资金问题，他随即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着手调查。但在 2006 年 1 月，当他准备通过媒体将调查到的情况加以公开披露时，媒体即遭到上海当地官员的责难和施压，从而这个案件又被包裹起来。

## 一 暗箱操作——中国之癌（上）（2）

上述三个因素构成了上海社保案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暗箱操作。实际上，不仅上海社保案如此，只要考察一下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几乎都少不了权力使用的暗箱操作这个因素。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暗箱操作已经波及多方面的经济社会生活，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许多弊端的一个病根，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癌。用搜索引擎搜索一下“暗箱操作”这个词，可以找到近百万个有关词条。尽管其中有些词条与我们这里关注的问题无关，但也可以大体看出暗箱操作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广度和深度。暗箱操作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非规则化使用，而公共权力之所以会出现非规则化使用，驱动力往往是私利，而条件则在于我们的权力模式。

暗箱操作问题在近些年间的凸显，源于转型时期公共资源权属改变及使用中的巨大利益。从最近几年时间看，国企产权改革、房地产领域

中的土地批租等，都是暗箱操作现象存在最为广泛和突出的领域。

房地产是我国社会中隐含权力行使秘诀最丰富、能够展现权钱交换关系最典型的领域之一。据有关机构测算，在 2002 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平均为每亩 12—97 万元，而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每亩 35—67 万元，也就是说，协议出让土地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收入相差 2~3 倍。据估计，1998 年后每年仅土地协议转让与招标拍卖挂牌转让土地价差一项，国库每年损失逾千亿元。正因为存在如此巨大的利益关系，房地产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几乎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同时也是媒体和坊间议论的经常性话题。但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却鲜有这方面的案件被披露。也许这只能用其手段和技巧的纯熟加以解释。只是在 2006 年，在房地产调控处于胶着状态之时，才陆续有一些官员由此落马，比如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等。而这些牵涉房地产的腐败大案，几乎无例外地都涉及以暗箱操作的方式实现的权钱交易。

在暗箱操作发生的场景中，并非没有内部性的制度和规则，但问题是，在权力面前，这些规则是软弱无力甚至根本不起作用的。在上海社保案中，领导人的一个批示甚至一个暗示，就可以决定这笔巨额资金的使用。从一些相关案例可以看出，在暗箱操作这种权力运作模式中，“领导批示”、“领导打招呼”，有时甚至是暗示或不表态（暗示），都是其中重要的元素。

从这种意义上说，暗箱操作是目前我们这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模

式的必然产物。因房地产中的权钱交易而落马的原青岛市崂山区区委书记王雁就说过这样的话：“表面上看，土地开发程序极为复杂，先由开发商给区长写用地申请，区长把用地申请通过分管区长批到国土局，局长再安排土地科填写审批表，经科长、局长层层签名再报到区里，缺少一个环节都不行。但实际上都是各个环节的一把手说了算。”“我是全区的一把手，自然说一不二。”比如，青岛有家房地产公司实力不强，看中了崂山区一块土地。总经理李某多次找王雁“做工作”。结果在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过程中，王雁明知违背土地法相关规定，仍在对方没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利用区委书记职权，安排国土资源局为其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并大笔一挥减免了1.6亿元费用。

暗箱操作，不仅导致公共资源大量流失，而且使得政府行为走样变形，甚至导致一些应当进行的改革无法进行和实施。前几年发生的国企改革争论，有人将其归结为主张和反对改革的争论，但其实，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国企要不要改革不如说是如何进行改革。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国企产权的转让不过是改革了国有资产存在的形态。就此推断，这样的改革不应当引起如此之大的分歧和争议。但问题在于这种产权的转让是如何进行的。在当时，即使是积极主张进行国企改革的人也不否认，在许多地方国企改制成了“内部人控制的改革”。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向本企业经营管理者转让国有产权，应该由直接持有国有产权的单位负责或其委托中介机构进行，经营管理者不得参与转让国有产权的决策、财务审计、离任审计、清产核资、底价确定等重大事项，

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但在许多改制的案例中，评估机构是由企业直接委托的，企业管理人员参与改制项目申报、改制方案的制订、资产申报等重大事项，有的更是连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公开相关信息和竞价拍卖的形式都不走。这样一来，大量国有资产被贱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给“内部人”。因此可以说，前一段我国国企改革出现的波折和受阻，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国企改革主张上的分歧，不如说是源于国企改革中暗箱操作以及由于暗箱操作导致的改革变形。

## 二 暗箱操作——中国之癌（下）（1）

事实上，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渗透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一种现象。只要我们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一下“暗箱操作”这个关键词，就会发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暗箱操作：大学生转系中的暗箱操作、超女选秀评奖中的暗箱操作、中小学收费中的暗箱操作、政府采购和投资项目中的暗箱操作、房屋拆迁中的暗箱操作、公务员考试中的暗箱操作、干部任用中的暗箱操作、国企改革中的暗箱操作等等。可以说，如此广泛存在的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失序的一个重要根源。

上面的暗箱操作现象虽然涉及的领域涵盖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但在这林林总总的暗箱操作现象中，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身影，这就是权

力。在社会科学中，关于权力可能有着很不相同的解释和界定，但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权力实际上就是能够决定点什么的能力。所谓暗箱操作，也就是对于这种权力的不公开行使。而我们知道，权力的行使在许多情况下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我们似乎就可以说，涉及的利益越是重大，人们不公开使用权力的愿望就越强烈，所带来的后果也就会越严重。

最近“驻京办”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据有人考察，驻京办的设立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那时是计划经济，驻京办成为沟通中央和地方的一个重要环节。但驻京办的真正兴起则是 20 世纪 90 年代。据有关数据，1991 年北京已有 186 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1994 年以后驻京办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除有 52 家副省级以上的驻京办之外，还有 520 家市级驻京办，5000 余家县级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 1 万家。最新的趋势是，不仅国有企业在京设立驻京办或联络处，一些大的民营企业也在京派驻了联络人员。如果以一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为 100 万元计算，这些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 100 亿元以上。

如此大的资金为何会用在这里？除了为来京的地方官员提供更好的服务之外，是为地方争取更大的利益，包括营造关系网络，在有关部门争取资金、项目、批文等。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经说道，现在，各省市、地、县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一般地说“跑部钱进”，人们也许还没有具体的印象，

但如果看一下下面的数字，问题就很清楚了。据李金华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2 次会议作《关于 2005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审计报告》，在 2005 年对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审计调查中发现，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级预算共编报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亿元，仅为中央实际补助亿元的。也就是说，中央实际补助中有近 4300 亿元（占全部的一半以上）未纳入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级预算中。对于这部分资金，至少要注意两点，首先，从使用上看，这部分资金的使用实际上脱离了省级人大的审查监督；从资金的来源上看，有相当一部分是与“跑部钱进”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要有驻京办，要有“跑部钱进”的重要原因。

另有数据表明，近年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逐年增加。2005 年，中央财政安排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已达到亿元，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 57%，地方财政支出的 45%。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涉及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透明”状态。据李金华的报告，2005 年中央财政分配的 239 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中，有 41 项存在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涉及资金亿元；有 65 项没有管理办法或管理办法未公开，涉及资金亿元。在这当中，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不透明性就更是突出。因为这种一般性转移支付，国家没有指定具体用途，无论是在拨付还是使用上，有关部门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其实，不仅在转移支付的问题上如此，凡是涉及重大资源分配问题的，包括政策性资源，几乎莫不如此。其间造成的浪费、不公、腐败，也就可以想见。

## 二 暗箱操作——中国之癌（下）（2）

而暗箱操作现象的广泛存在，特别是与行政权力相联系的暗箱操作现象的广泛存在，不仅导致重要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导致腐败现象的广泛发生，更重要的是，这种暗箱操作成为瓦解制度和规则从而瓦解社会生活基本秩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暗箱中的暗，是同时对上对下而言的。对上，它使得自上而下的权威和控制失去效力；对下，它使得公民对权力的监督成为不可能。因此，在暗箱操作现象严重存在的地方，种种的弊端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

几年前被揭露的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白山市统战部部长李铁成卖官案中，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在他担任靖宇县副县长、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竟没有一个单位不向李铁成行贿的。在全县范围内，李铁成受贿没有“空白点”。调查结果表明，全县科、处、局级干部除李铁成本人和他的妻子外，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吉林省检察院“李铁成受贿案侦查终结报告”中长达 9 页的“行贿人名单”显示，行贿者分布在县委、县政府机关各个部门，基层乡、镇机关，省直、中直企业等 100 多个单位。而李铁成，不过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卖官案中的一个极端的典型，在近些年频发的腐败大案要案中，涉及买官卖官的已

经占有一个相当大的比重。

买官卖官何以在我们的社会中相当广泛存在？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官职是一种与金钱几乎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资源；二是官职的获得，或者说干部的任免是封闭性操作的。这里所说的封闭操作，实际上也就是成为一种正式制度的暗箱操作。

2006 年年初，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曾经通报了一批此类案件。其中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卖官的案件最为引人注目。有关部门调查了武保安从 2003 年 1 月 10 日到 2004 年 3 月 18 日银行账户上的存款纪录，可以说日进万元。这一年多，正是他任县委书记期间。值得注意的是，在武保安案发之后，他妻子说了一句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话：“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而从其存款纪录中也可以看出，在担任县长时，他的存款数量很有限，但在担任县委书记之后，他的存款数量直线上升。其原因就在于，只有县委书记才真正掌握干部的任免权。问题不在于在他任职期间任免了多少干部，而在于这种任免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曾有评论说，现在卖官已经卖到“毫无技术含量”的地步。而买官卖官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地步，从根本上说，就是暗箱操作这种权力运作方式为其预留了空间。武保安卖官的常用方法之一，就是“度身定做”。比如，在一次讨论人事安排的常委会上，针对原先确定的推荐对象的年龄条件，武保安提出“能否加一条：工作突出，担任正职的干部年龄可放宽一岁，参加推荐”。当一位副书记提出不同意见时，武回答道：“可以定为：工作业绩突出，担任副书记、人大主席的年龄可放宽一岁参加推荐。”此时，又有一位副书



记提出了不同意见，武保安答道：“年龄为 1963 年，加一个括号含人大主席，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放宽年龄的表面理由是“把好苗子选拔进来”，而实际上，放宽年龄针对的只是某一个人，这一点大家当时也心知肚明。有人在书记会上对他的任免方案提出不同意见，武的回答则是，书记会议就这样定了，有意见常委会上讲。

值得人们注意和深思的是，这种暗箱操作式的干部任免过程，好像是违反了干部任免要经有关组织部门的考察以及集体决定的正式程序，是与正式制度格格不入的，是权力正式行使的某种例外，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从根本上来说，暗箱操作这种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方式根植于我们的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因为长期以来，一些地方人事任免和重大问题决策的隐秘化、神秘化，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的惯例。暗箱操作，就是这种制度背景下的不可避免的产物。

### 三 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间（1）

从表面上来看，暗箱操作似乎是一种与正式制度和正式程序相背离的现象，但实际上，暗箱操作现象的广泛存在，有其深厚的制度基础，这个制度基础就是它欲背离的正式制度和正式程序。换言之，恰恰是作为暗箱操作背离对象的正式制度本身成为暗箱操作的前提和条件。

在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有一个经常使用的名词，即“运作”。也就是说，确定要做某一件事情之后，要将这件事情办成功，就要开始“运作”的过程。常见的说法是，“下面就是运作的事情了”，“我需要有个运作的时间”，或者是“这个事情得需要去跑”。一项商务活动要“运作”，一个官员的升迁有时也需要去“运作”。全国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在北京设立的上万个驻京办事处，日常的工作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运作”。“运作”的真正要义，是要使不能办成的事情或可能办成也可能办不成的事情能够办成。

“运作”的过程当然是需要成本的，但只要“运作”能够成功，运作者将获得大于运作成本的收益，而运作的成本则成为被运作对象的权力持有者的收益。各类腐败现象千变万化，但其基本的规律和逻辑，也就大体如此。

在现实生活中，暗箱操作的现象以及进行暗箱操作的人们往往成为被指责的直接对象，但实际上，暗箱操作的空间却是正式制度事先预留好的。因为没有这样预留的空间，暗箱操作就没有进行的余地。如上面所说的“运作”，在其实实施的过程中并不是不会遭遇程序与规则，如果不会遭遇这些程序和规则，也就不需要“运作”了。确切的情形是，其所遭遇的程序或规则，要么是缝隙过大，要么是软性的。因此，成功的“运作”就意味着穿越缝隙和扭曲规则。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什么这些程序或规则可以被穿越和扭曲？

比较中国和苏东国家的改革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区别，即苏东国家的改革往往是首先从正式的规则和程序入手，而中国的改革则更

多是通过变通进行的。在这里，我们不去评价两种改革策略的是非优劣，但我们至少可以发现隐含在这两种改革策略背后的实际是两种明显不同的制度特性。

在描述改革前我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使用集权、僵硬、严密等这样的字眼。但这时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个体制另一方面的特征，即体制的粗疏性。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科层化行政机构的不发达，“蜂窝状组织结构”的存在，以及缺少为集权式体制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信息与统计数据，其体制的本身是相当粗疏的。在这种粗疏化的体制结构中，形成的是一种模糊化的决策方式和社会动员式的运作社会生活的方式。这种模糊化的决策方式体现在，它只提出笼统而含糊的目标，对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只提出相当原则性的要求。“做计划要留有余地”、“计划要宜粗不宜细”、“在原则上要如何如何”、“因地制宜”等等，都是这种粗疏化体制运行的典型特征。在实施的层面上，其程序化和规则化的程度是很低的，执行者具有较大的相机处置空间。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特性称为僵硬而粗疏制度中非程序化的弹性空间。

这种体制的特征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改革进程。在改革的过程中，许多实质性的措施，特别是面临较大阻碍的改革措施往往都是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的。所谓变通，是这样的一种权力实践，从表面上看，它所遵循的原则及试图实现的目标与原制度是一致的，但变通后的目标就其更深刻的内涵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与原制度目标不尽相同甚至根本背道而驰。其具体的方式包括重新定义政策概念边界，将硬性约束软

化，以扩大政策约束的空间；选择性执行；利用制度约束的空白点；打政策的“擦边球”等。这样的改革策略有利于避开改革的某些阻力，对于瓦解旧体制也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问题是，这种以偏离正式体制为特征的变通行为也为以后留下了“祸患”。问题很简单，变通可以成为瓦解旧体制的利器，也可以成为阻碍新体制有效运作的工具。尤其是，由于变通在改革中居功至伟，事实上也就使后来偏离正式制度的行为获得了合法性。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形成一种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价值观。

### 三 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间（2）

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世俗化的过程。在经历了 30 年改革开放过程的今天，利益已经取代意识形态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操作系统”。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个社会的时候，却发现我们没有为“操作系统”的更换做好准备，甚至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安装这个新的“操作系统”所需要的硬盘空间。

关键的问题是，当利益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基本的社会驱动力之后，权力在已有灰色制度空间中的行使具有利益的新驱动，而原有意识形态的约束却已基本消失殆尽。这样一来，制度中原有的非程序化的弹性

空间也就成为利益驱动的暗箱操作的灰色制度空间。换一个角度说，本来进入这个利益时代的时候，应当通过正式制度的建设来缩小可以容许暗箱操作的灰色制度空间，应当为可能在利益背景下行使的权力设定新的硬性制约条件，但在实际上，在改革初期起到积极作用的变通，却在利益这个新的“操作系统”上演变为以谋取特殊利益为目标的权力暗箱操作。如果说在过去，变通还是体制固有的运作方式的话，在今天，暗箱操作已经成为纯粹的谋利行为。

事情还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利益的驱动，保护甚至拓展容许暗箱操作的灰色制度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动。在有关腐败的研究中，有人发现这样一种新的趋势，即由寻租到有意设租。正如有学者界定的，所谓设租，就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权力的服务对象设置关卡与障碍，向相关人员和机构或直接收取或间接“逼”其交纳通向正当权利和利益的“过路费”。而这种设租的过程，有许多就是通过拓展制度的灰色空间实现的。相反，一些可以从根本上缩小制度灰色空间、杜绝暗箱操作的举措，如权力行使的程序化、公开化等，在改革中一直踟蹰不前。甚至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特殊利益群体通过将上述可能的改革措施敏感化的方式，来自觉地抵制类似的改革，以保护甚至扩大制度的灰色空间，保护甚至扩大其暗箱操作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比如在国企改革中，他们要努力推动国有资产出售，但却对国有资产出售程序的规范化不感兴趣，甚至暗示人们那是不可能的，更有甚者是将国有资产出售过程神秘化和保密化。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暗箱操作存在的基础，是神秘化的权力模式。在

我们现实生活中，一般的公务，一般的经济社会生活数据，往往成为一般民众不得与闻的“秘密”；党政机关不是民众可以自由进出的场所，反而成为戒备森严的“军事重地”，这几乎是一种常态现象。在“文革”期间，权力的神秘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运作社会生活靠的就是每年几十或几百个中央文件，而这些文件几乎全部是只允许传达到某某级的“机密”。在过去 30 年改革过程中，权力神秘化的程度有所改变，但基本的权力模式却没有根本性变化。在这样的权力模式之下，权力的暗箱操作几乎是必然的。虽然权力的运行有着种种的内部规则和程序，但政务活动的高度神秘化，必然会使抑制权力暗箱操作的因素失去足够的力量。

给人以希望的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05 年底，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理念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机关如果拒绝公开信息，公民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可以想象，政务信息的公开，将会从根本上缩小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间。另外的一则报道是关于河北省的。从 2005 年开始，河北省以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邯郸市政府为试点，大力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改革，依法清理行政权力项目，公开政务运作流程。在这项意义重大的改革中，一个人们以前闻所未闻的名词是“清理权力”，甚至公布市长权力清单，公开政务运行环节。河北省大刀阔斧推进政务公开，与此前发生的几起腐败大案有直接关系。河北省原外经贸厅副厅长李友灿在一年多时间里，利用审批进口汽车配额的权力，收受贿赂高达 4744 万多元，创

下了当时贪官贪污数额的最高纪录。而李友灿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攫取如此大量的财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灰色制度空间提供的暗箱操作的余地。事后查处李友灿贪污案时，竟然有许多官员不知道李友灿还管着进口汽车配额，即便有人知道他管着此事，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审批的。而李友灿本人更故意将权力神秘化，在具体操办时只有他和为数极少的几个亲信了解。几个人一“捏咕”，就算完事了。正是这样的教训，使河北省委、省政府认识到：“阳光是腐败的天敌，公开是腐败的克星。无论是站在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考虑，都应该探索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进一步加大权力公开的力度。”

#### 四 过度保密与权力运作神秘化（1）

2006年1月23日，郑州市民任俊杰开始向咪表发难。因多次申请查询咪表规划被拒绝，他以侵犯公民知情权为由将郑州市规划局和城建档案馆告上法庭。

事情的缘起是，在2002年，经郑州市城市规划局规划批准，郑州市停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在郑州市区沿街道路上设置了3000多个咪表停车位。由于这些咪表停车位大量占用慢车道、人行道，甚至盲

道，给市民出行带来很大不便，任俊杰认为咪表设置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规划局在停车位规划中出现了错误。为了求证这些停车位是不是咪表公司擅自设立的，是否经过规划局审批，他和律师先后到规划局和城建档案馆查询相关材料，均被以种种理由拒绝。郑州市城市规划局认为，原告要求查阅的有关规划材料，存放于郑州市城建档案馆，并非被告所持有；另外，提供档案查询也并非被告的职责范围。郑州市城建档案馆认为，自己不属于行政机关，原告对自己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依据有关规定，原告所要查询的档案资料，属于秘密级档案。这类档案的查阅，需要严格的审批手续。原告做法不符合本馆制定的查阅利用规定，所以没有对其提供查询服务。

对于这件事情后来的结果，不是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我们这里关注的问题是，郑州市城建档案馆的回复表明，一个城市的停车位规划，竟然是被列入“秘密级”档案的，是普通市民没有权利查询的。在法庭辩论中，二被告均多次强调说，任俊杰要求查阅的相关资料属于国家秘密。

由此联想到我们这里讨论的暗箱操作问题。在《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间》一文中我曾指出，恰恰是作为暗箱操作背离对象的正式制度本身成为暗箱操作的前提和条件。这也就意味着，要从根本上解决暗箱操作的问题，就必须改变为暗箱操作提供制度环境的正式制度。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政府行为和信息的过度保密与暗箱操作还不是一回事，但由于过度保密造成的权力运作高度神秘化，无疑是暗箱操作得以盛



行的基本制度背景之一。

我国目前的保密制度是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逐步形成的。最初形成保密原则和制订保密制度的时候，战争才刚刚结束，国内外都存在相当大的敌对势力。这是当时的基本判断，也是制定保密制度的基本依据。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保密制度无疑是极为苛刻的。

1951 年 6 月 8 日国家政务院发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虽然框定了国家机密的 17 个方面，但实际执行中，边界是非常含糊的。

正如有关方面专家指出的，当时保密的实际原则是，“凡未公开的信息都被视为国家秘密”。也就是说，凡是政府认为不能公开的，或者是不想公开的，甚至是没有想到公开的，都属于国家秘密。这在当时具体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政治社会生活常规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保密制度也在进行相应的改革，但其基本原则和制度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社会生活程序化程度低的社会中，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的实际运作模式往往比纸面上的规章制度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有关政府工作信息保密的事务也是如此。这种实际工作模式是在特定环境下通过长时间经验的积累慢慢形成的，有时甚至是不言自明的。比如，由于国家秘密内涵和边界的模糊，许多完全不该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的信息被定了密。如 2006 年许多地方传达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的一号文件，都标有“机密”字样。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复印这份实际上没有任何秘密可保的文件就是窃取国家机密；由于定密权的规定是模糊的，特别是由于对政府信息披露几乎完全没有明确规定，这就赋予了各级政府甚至其

中每一个官员定密权。于是在许多地方，不该保密的信息被定了密，有的地方甚至将关于向先进人物学习的文件、将某乡一个中学死亡学生事件都定为秘密，而将基层选举、廉政状况、银行坏账等作为机密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该保没保的是错误，不该保的保了只是刻板一点而已。

#### 四 过度保密与权力运作神秘化（2）

政府工作信息的披露与保密制度，涉及的不仅是保密事宜，实际上会从根本上塑造权力的运作模式。而这种过度保密的保密制度和运作模式，无疑对权力神秘化运作模式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保密的结果是使权力失去应有的监督。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也曾经在权力的监督上做过许多文章，有些努力也不能说不真诚，但其结果往往都是有限的。可以说，只要权力是神秘化的，真正的监督就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有的社会中，人们常说舆论监督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往往是制止舆论监督的力量是强大的。其原因就在于，制止舆论监督常常是以保密的名义进行的。有论者曾经指出，在我们的权力神秘化运作中，事实上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官员拥有了一种“封口权”。比如 2006 年云南某

地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丰田越野车将一骑摩托车的人当场撞死。虽然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在全国每天会发生数千起的交通事故，但由于开丰田越野车的是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事故马上就成为要保密的信息。事故发生后，当地领导向所有村民“打招呼”，不要向新闻媒体反映此事，以防止媒体进行报道。其理由也许是冠冕堂皇的，比如防止不实信息产生误导，影响政府形象，影响安定团结等。但问题是，如果这些理由都能够成立，对政府的监督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应当看到的是，如果说过去权力运作的神秘化还更多是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今天，这当中利益的成分已经越来越大。而且，由于利益的驱使，甚至使维护权力的神秘化成为一种自觉的努力。2005年，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受贿和私分国有资产案被披露出来。最后查明，毕玉玺共收受贿赂 1004 万元，私分国有资产 300 万元。在该案中有一个引起人们注意的细节，即有关部门在审查五环路工程后发现，在他任职期间，有些工程造价高于合理造价近 1 亿元。即使在公路建设这样的大型项目中，工程造价高于合理造价近 1 亿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一切都顺利通过，没有有效监督，甚至由于信息的保密，连多少有点根据的怀疑都没有。

事实上，现在权力运作的神秘化，已经不是有利于维护权力的权威，而是成为危害权力的权威性，甚至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很多问题也就由此而来。2005 年河北省定州市曾发生震惊全国的袭击村民事件。当年 6 月 11 日凌晨，绳油村发生两三

百人袭击村民事件，造成 6 名村民死亡，100 多人不同程度受伤。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征地与补偿问题。但这当中也有一个情节是值得注意的：村民之所以坚守土地，强行阻止施工，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补偿款是 4600 万元，而村里得到的只有 500 万元”的说法。按照事后有关方面的解释：定州电厂共占地 1748 亩，全部征地费用 5929 万元，每亩征地费用 33919 元，按照国家、省有关政策规定，此项费用每亩需上交国家和省、市 19584 元。经市委、市政府研究，每亩兑付村 15480 元。电厂灰场和灰场路共占用绳油村土地亩，征地款共计万元(含青苗补偿费)。也就是说，村民对补偿款总额存在误解。本来，只要信息是透明的，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村民也要求公开征地补偿方案及合同，但却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于是村民们的一个基本疑问就是：“你们占我们的地，到底给我们村多少钱？”双方的僵持状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实际上，信息的过度保密与权力运作的神秘化，将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在社会发生危机和紧急情况的时候，这个问题将会显得尤为突出。

2005 年 8 月，民政部和国家保密局联合发布《关于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的通知》，宣布从 2005 年 8 月起，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不再作为国家秘密事项。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是政府走向信息公开化的一个重要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步骤。随着《保密法》的修改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人们也许可以期待一种不仅仅是在保密制度而且也是在权力运作模式上的实质性变化。

## 五 阳光如何穿透暗箱（1）

暗箱操作的关键是权力运作的不公开不透明，这已经是用不着论证的共识。现在许多人也都会说这句话：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然而这个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要真正起作用却并不容易。

在上海社保案中，权力的不透明和暗箱操作，也是必有的内容。于是，人们也就将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权力运作的透明和公开化上，或者用更标准的话说是政务公开。

然而，一则消息让这样的思路变得不怎么流畅。

2004年5月1日前后，上海和全国各大媒体差不多同时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上海打造透明政府，政府15个部门开始信息公开。根据这则新闻，新一届上海市政府成立伊始，就提出了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目标，其根本出发点是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手中的权力真正为人民谋利益。报道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直接部署下，在广泛听取并采纳市人大、市政协以及各方建议意见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月20日发布了第19号令，决定从该年5月1日起施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报道说，“透明政府”计划，将成为新一届上海市政府“自我加压、自我革命”的切入点。实行信息公开化

的部门，均是被称作公权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而且，再往前追溯，上海市又是我国第一个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地方政府，其时间是2003年6月3日。而建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宗旨，也无疑是为了促进政务公开和信息披露。

再查上海社保案的进程。2002年3月，张荣坤以32亿元拿下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收费经营权；2003年又以50亿元买下嘉金高速公路25年经营权，这条路通向上海F1方程式赛车场；在此前后两三年中，张荣坤接连大手笔投资高速公路，到2005年6月，福禧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已达200公里，总投资超过100亿元；2004年张荣坤的福禧投资跻身上海电气改制，最终出资9.6亿元持有8.15%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福禧投资还是2005年3月成立的上海电气集团的战略投资者，出资额为5亿元。上海社保案败露之后，我们都知道张荣坤这一系列的投资或资本运作行为，大都与上海社保案有关。也就是说，上百亿的社保基金，就是在这期间，即在上海大力推进构建透明政府期间被挪用的。

把这两条消息放在一起也许多少令人有些尴尬。信息公开也无法解决暗箱操作和腐败的问题？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近几年来，政务公开在我国已经有了明显的推进，比如电子政务、信息公开、新闻发言人制度等等。这些进展无论如何都是有意义的，是应该加以肯定的。即使是暂时起不到实质性作用的措施，尤其是制度性措施，更应该坚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重程序的思维。但同样明显，正如上海社保案所表明的，目前已有的信息公开化措施，对于制止实质

性的暗箱操作和腐败，还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阳光如何穿透严实而坚固的暗箱？河北省邯郸市的政务公开试点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在邯郸试点中，至少有如下几点是特别需要给予重视的。

第一，明确权力的边界，列出权力清单，明确权力责任。在邯郸市的权力清理中，共取消市政府本级和市直 70 个单位的行政权力 266 项，占总数的 10%。最终进入新政府权力清单的包括 384 项行政许可权、420 项非行政许可权、521 项行政处罚权、25 项征税权、184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权。在权力清理的基础上编制了《邯郸市人民政府行政职权目录》。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权力是有限而明确的，是可以用数量来表达的，比如市长手中公开行使的权力有 92 项，此外还有 10 项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不公开行政权力。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建立有限政府必须从明确有限权力开始。而过去的权力处于无法监督状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权力是模糊而无限的。甚至常有以父母官自居的官员不无自豪地标榜自己“大事小情都得管”。其次，确定权力的依据是法律。在清理权力的过程中，有关部门至少查阅了 4000 部法律法规。在取消的 266 项权力中，有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有的是与相关法律抵触的，而确定保留的一定要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这样就使权力行使的过程成为运用法律法规的过程。再次，权力的行使人，以及与权力相联系的责任是明确的，也就是说，谁拥有和行使这项权力，谁就要对此负责。

## 五 阳光如何穿透暗箱（2）

第二，明确和公开权力的流程。权力的明确并不能保证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不被滥用。实际上，人们经常抨击的“滥权”、暗箱操作现象就是发生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在邯郸，采取了一种也许会被人们看做笨拙原始的做法，就是绘制权力流程图。所谓流程，就是程序。权力在暗箱操作中失去监督的可能性，恰恰就在于权力行使的程序化程度过低，权力行使的步骤、规则均模糊不清。在邯郸制定的“行政权力运行说明书”中，为依法确定的 2515 项行政权力绘制了详细的流程图。凡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程序的，依照法定程序制作流程图；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依照工作程序逐项标明具体承办岗位、职责要求、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投诉举报途径等，形成工作流程。这种流程图细化到具体的细节，如“谁来办”、“怎么办”、“什么时间办结”；同时对每一项行政权力的运行时间、运行条件、运行信息反馈、操作规程都有刚性约束，如“过期不办，视为默认”，“一次签字，不能修改”等等。

第三，以网络为平台，使权力透明运行。其制定的《邯郸市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公开管理办法》，对政府信息公开应当遵循的原则、范围、程序、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通过政务网站、新闻媒体、新



闻发布会、政府公报等形式，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办公地址、联系方式、职权目录、人员分工、办事条件、办事程序、服务承诺、工作纪律和责任追究等情况进行全面公开。网络提供的平台，不但使权力得以透明运作，而且使得权力透明运作的过程成为民众与政府互动的过程。据报道，包括邯郸论坛在内的政民互动网络平台平均每天受理信息 2000 多条。

从上面几个因素可以看出，与一些地方形式主义式的政务公开相比，邯郸的政务公开有着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但就目前的进展而言，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一是责任追究制度。信息的披露，权力的公开行使，意味着权力的自我约束。在实践中也明显存在随意性较大，想公开就公开，不想公开就不公开，信息公开时避实就虚等问题。对此，邯郸市出台了《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投诉受理办法》和《责任追究办法》，本着“分级负责、下管一级”的原则，重点就应公开而不公开，公开而不全面、不及时、不真实，权力运行不规范，监督管理不到位等情况做出相应规定，明确了责任追究的具体事项和操作方法。二是信息公开的质量。比如，根据现有的做法，我们还看不出诸如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信息如何有效公开和接受监督的问题。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政府的财政预决算报告内容是否公开，而是涉及预决算报告的信息质量问题。仅就我国各级政府公开的预算草案来看，即使是其公布的数据，公众也很难对其进行处理和判断。甚至一些专家，对那些数字也往往是雾里看花。因此，一些看起来似乎明确的信息，实际上是无效信息。

比如用相对数对应绝对数，用绝对数对应相对数等，这种最简单的办法也使得透明财政成为空谈。三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的信息是大量的，所涉及的规则和程序有的相当复杂，有的甚至是非专业人士无法处理的。以专业对专业，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唯一办法。因此，需要通过其他制度建设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些问题，将另文讨论。

## 六 监督的基础是什么？（1）

频发的腐败案件，使人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信息透明、政务公开、权力监督的极端重要性。上海有关方面负责人也强调指出，要根据社保资金案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加强对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但现在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所有这一切需要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在过去的两年中，有两件均与交通部有关的事情，是很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是，2005年《中国青年报》曾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张春贤部长，我想监督您可无从入手》。事情的起因是，交通部部长张春贤让记者捎话给社会各界：“作为交通部部长，欢迎大家对我进行廉政监督。”张春贤还要求全国各地交通厅、局长和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要学会并习惯在被监督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中国青

年报》的文章指出：交通部门近年来一直是腐败的重灾区，短短几年中，全国已有十几个省区的交通厅厅长在公路建设工程中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刑，如此背景下，张春贤部长作这样的表态当然值得赞赏。但在赞赏之后人们却发现，对张部长欢迎大家做的事——“对我进行廉政监督”，似乎根本无从下手。我们既不知道部长权力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权力是如何行使的，既不知道部长的收入是多少，也不知道部长的夫人和子女都从事什么职业……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无从监督。要让权力是可监督的，必须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作支撑。比如，储蓄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等的实施，以此来让官员的收入和家庭财产情况透明。

2007年初，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高家伟又致信交通部部长李盛霖，信中提出：交通部应该公开每年的养路费应征数额是多少？而实际征收上来的数额又是多少？实际征收上来的养路费又用到哪里去了？高家伟教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他之所以要写这封信，是因为他在交通部官方网站上看到交通部副部长冯正霖此前的一个关于征收养路费的讲话，其中谈道：“为了满足348万公里的公路的正常养护费投入，每年至少需要1000亿元的资金，而全国养路费中真正用于公路维修和养护的资金约500亿元。”因为高教授在“讲话”中没有找到全国一年征收的养路费总数，无法理解冯副部长讲的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因此萌生了询问交通部部长的念头。高家伟告诉记者，在政府信息日益走向公开的时代，养路费缴纳义务人有权利了解自己所缴纳养路费的征收标准、计算依据和使用去向。他强调，公民盲目缴

费的时代应该成为历史。

这两件事情提出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权力的监督如何才能成为可能？合乎逻辑的回答当然是信息要公开透明。但是仔细一追究，发现事情又不是那样简单。比如前一段关于公款消费的数量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关于公款吃喝、公车、公款旅游等公款消费的数量，一直是人们非常关注但又众说纷纭的事情，其中不断有人发布一些数据，但仔细追究，似乎又都缺乏足够的根据。在 2006 年，甚至就此引起一场纷争和热议。2006 年 3 月 13 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发表了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其中提出，2004 年我国公车消费 4085 亿元，公款吃喝在 2000 亿元以上，1999 年干部公费出国花费达 3000 亿元。这就是后来引起很多议论的公款消费 9000 亿元说法的来源。然而，在对这些数据进行核实的时候，人们却发现很难找到可靠的原始出处。于是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给出了另外一套数据，2004 年末全国共有各种公车 180 万辆，全年公车消费大约为 1000 亿元，2004 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公款伙食费如果按“招待费”的 40% 估算大约为 172 亿元，2004 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出国费用约为 29 亿元。以上三类开支合计 1201 亿元。该负责人同时表示，上述数据是根据中央和地方决算报表所列数据统计的，实际生活中估计会略高于这一数字，但远远没有达到竹立家教授所说 9000 亿元的水平。

## 六 监督的基础是什么？（2）

但正如有论者所表明的，上述的估算是存在明显问题的。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公布的数据口径是预算内的，但预算外的支出，由小金库来支付的，转嫁到下属单位甚至企业中去的，实际上根本无法统计，只能根据一些相关的数据进行估算。比如，公车的使用费用，只能根据公车的总量乘以单车使用费用，而这里的单车使用费用又往往是根据个别单位或地区的数据。公款吃喝的数字，据我所知，原来主要依据的是饮食发票的数据。这些数据的不准确是自然的，比如饮食发票记载的数字，有的是属于事业单位的，有的是属于企业的，有的甚至是属于个人的。但问题是，在常识中人们也知道公车、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所需的费用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在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出来公布预算中的数据之前，除了估算的数据之外，人们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对“三公”消费形成数量化概念的可靠数据。而且，正如上面所说的，即使是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会比看起来缺乏足够依据的估算数字更为可靠吗？以公款吃喝为例，2005年全国餐饮业零售总额是8800多亿元。按照财政部的数字，行政事业单位公款伙食费只占全国餐饮业零售总额的2%左右。再将公车费用与公款吃喝进行比较，公款吃喝的费用只占公车费用的17%。且不说能享用公款吃喝的人数会大大超过配车

或能享用公车的人数，就算两者的人数是一样的，按照财政部的数字，一个配车或能享用公车的人一年公款吃喝的费用只相当用车费用的20%？再比如，财政部负责人说2004年全国公车有180万辆，而据北京市交通部门最新数据，光北京市（包括中央单位就有公车80万辆）。显然，财政部的数字可能不是一般地低估了上述数字，而是大大低估了上述数字。那么，有据可依的官方数字和缺乏可靠依据的估算数字哪个更贴近真实呢？

当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不是想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们的问题是，像“三公”消费这样一个数目巨大的、涉及公民税收或公共资源如何使用的问题，人们如何进行监督，人们如何获得进行监督所必不可少的数据和信息？而我们知道，充分的和可靠的信息是监督的基本前提。这个问题直接涉及信息公开中的“信息”的质量和可处理性问题。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曾经说过，“从国际惯例考证，公车消费、公款伙食费、出国费用等在发达国家也列入政府预算支出，是政府成本的组成部分”。这话如果不考虑数量的含义的话当然是不错的，世界上哪个国家一辆公车也没有？哪个国家官员没有一分钱的公款吃喝？即使我们不深究这个问题的更实质性的内容，人们至少可以有一个并不过分的要求，你既然按照国际惯例花了这个钱，就应当按照国际惯例对这些花费进行记录，能够掌握其具体的数量。而这就涉及预算编制和统计分类等问题。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曾经说过，我国现行预算支出科目主要是按“经费”性质进行分类的，把各项支出划分为行政费、事业费等等。这种分类方法使政府究

竟办了什么事在政府预算上看不出来，很多政府的重点支出如农业、教育、科技等都分散在各类科目之中，形不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不透明、不清晰，往往造成“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由此看来，预算和统计中的分类等问题，看起来是个技术性的问题，但实际却关涉信息的质量，进而关涉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是否可能。说得更明确一点，当我们在改革中要实质性地而不是形式地推进信息透明和政务公开的时候，就需要提供使监督成为可能的信息基础。换句话说，使数据和信息能够具有接受监督的基础，应当成为信息和数据采集的原则之一。

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是为了说明，在当今时代，信息与数据的问题可能包含着复杂的含义。特别是，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在涉及利益关系的时候，将数据和信息作为一种博弈手段，也是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前两年在房地产调控中就有人呼吁，需要来一场房地产统计风暴。因为有关房地产的一些重要信息，存在明显的混乱。比如像房屋空置率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数据，建设部报告说，2004年商品房空置率为7%，而学者则指出比较可信的数字为20%，甚至远不止20%。关于房价的涨幅也是如此。信息与数据的混沌和迷离，也许不仅仅在于统计工作中的缺陷，同时也在于人为的误导，因为其中相当一些数据的误差不是随机的，而是一种系统误差。其背后的利益关系是不言自明的。

## 七 真的透明产生于多次互动（1）

有人注意到，在 2007 年地方两会上，一些“两会”代表，特别是政协委员开始“不客气”了。比如在官员接受质询的过程中，一些代表或委员穷追不舍，不断追问，甚至抢白、打断等过去基本见不到的现象也都出现了。

对于这种现象其他方面的含义，已经有论者进行讨论，本文的分析则力图表明，这种代表或委员与官员之间在质询过程中的多次互动，对于实现真正的信息公开和透明，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需要使这样一种程序成为信息透明和权力监督的常规性机制。

我们可以看一个典型的案例。2007 年初，在广州市人大会上，番禺区代表团杨锦链代表曾就劳动保险金收费问题，对政府有关官员进行质询，并在质询过程中多次进行追问，在追问中杨曾多次打断政府有关官员的陈述。

事情的缘起是，2006 年广州市建委发出《关于番禺、花都、南沙、萝岗区实行建设项目劳动保险金统一管理工作的通知》。杨锦链认为，这个文件涉及重复收费。在人代会上，杨一口气提出了五个尖锐的问题，包括是否重复收费，拨付数字的计算，未拨付款项的使用，相关管理费的法律依据，核发施工许可证问题等。其实，这些都是很专门化的问题，笔者本人也无法弄清这当中的是非曲直，而且这篇文章的



目的也不是弄清这当中的是非曲直。

但接下来的过程是每个人都能看懂的。

据报道，这项质询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对于杨锦链代表提出的问题，市建委建工委书记林波首先表态，并表示将尽可能让代表满意，然后授意由市建委劳保办主任孙爱宾作具体回答。报道说，孙爱宾客套了一番后表示，由于在座的各位对劳动保险金不是很清楚，便开始介绍劳动保险金的基本情况，介绍它的创立背景及目前的运营形式，并说劳动保险金其实就是工程总造价里边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间，杨锦链插话说：“我觉得你讲的东西跟我提的问题已经不一致了。”他说，孙爱宾说的劳动保险金其实就是包含在工程总造价里边，而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建委的文件并未具体规定，建设单位为了拿到许可证，往往是先按照原来规定的工程总造价的3—31%缴了一次费，后又按照2006年刚实行的新文件里规定的3—04%的费率再缴一次。这根本上是两回事。随后，对于孙爱宾所作的介绍，杨锦链又先后三次打断了他的话，对相关问题进行询问。杨锦链直言不讳地表示：“你的话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问题，我们代表不是来向你们学习文件的。”因为据报道说，孙爱宾的介绍用了近一个小时，然后才开始回答第一个问题。

人们可以发现的是，在其后的对话、插话中，一些实质性问题开始得到澄清。比如，杨锦链表示，他曾打电话到建委问前后两种收费是不是一种收费时，对方明确表示“此费非彼费”。对此，孙主任无言以对，市建委纪工委书记林波表态说：“这是领导对自己的部属没有教育好，

没有培训好。等人代会结束以后，杨代表和联署的六位代表，有空请到建委去，我们再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期间，还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得到了澄清。会后，有记者问杨锦链代表是否满意。报道说，他先只是笑了笑，想了一会之后，他说，通过询问，让代表们明白了这里边的一个大概情况，而对方领导也坦承不是重复收费的问题，只是在文件的执行上存在一些不足，不足还是可以纠正的。

## 七 真的透明产生于多次互动（2）

信息透明，政务公开，这已经是社会的基本共识，也是业已明确的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但信息透明和政务公开远不是按照某些规定，按部就班地将信息该透明的透明，该公开的公开那样简单。行政机构运作的政务信息，有的涉及相当复杂的专门化问题，有的与其他事物有着复杂的关联，有的既涉及政策的制定也涉及政策的执行过程。因此，只有单方面的简单信息披露，而没有相关的互动程序，许多重要的信息，仍然会处在云里雾里的状态。以这次广州劳动保险金问题而论，有关的文件已经是明文公布的，征收的具体规定和方式也是公开的。仅仅从狭义信息公开的角度来说，应该也不存在明显的问题。但在这些明显信息的背后，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公开和澄清的信息，比如

相关费用征收的法律依据，许可证发放及其前置条件的法律依据，这项费用和另一项费用的关系，是否重复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中才能加以澄清的。可以说，没有这样多次互动的过程，真正的信息透明就不可能实现。

这样多次往复的信息互动过程，还在于能够去掉那些妨碍信息透明的因素，使得信息的披露更直截了当，使得隐瞒信息更加困难。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是，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官话和套话的盛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即使是在两会上，哪怕涉及的是很实质性的问题，各种云里雾里、言不及义的官腔套话也屡见不鲜，有限而宝贵的时间往往就被这些没有什么信息量的官话套话浪费掉了。因此可以说，官话和套话是阻碍信息透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直接的互动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掉这个因素。有关报道说，在 2007 年 1 月 26 日举行的重庆市民代表座谈会上，重庆市教委一名副主任在回答一位市民代表关于如何堵住买卖生源漏洞的质疑时，曾经被 80 岁高龄的政协委员雷亨顺中途抢白：“请直接回答问题，就说你晓得还是不晓得，具体该怎么办？”对于重庆雷委员的中途抢白，重庆教委这位副主任说：“我没分管职业教育这一块，所以不太清楚情况。但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教委也先后查处了不少违规……”当被要求举出几个例子时，副主任显得十分为难：“不是很清楚，这个我举不出来。”可见，抢白之后，问题才没有被回避掉。

由此可见，明确信息透明是一个博弈过程。这样的博弈过程有时甚至要包括施加压力等因素。

其实，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就是现代社会中已经被广泛使用的质询过程。质询是国家代议机关对国家行政等机关进行监督的一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有关规则还规定，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或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如有相应数量的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如果有半数以上不满意的，可以要求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问题在于，这样一项程序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往往没有被有效使用。质询案立案条件过高，会议议程难以确保足够时间以保证质询的进行，以及包括相关机构和“两会”代表本人对质询存在的误解，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因此，在相关的改革中，应当将健全质询制度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首先是应当将质询常规化，看做是代议机构常规化议程的一部分，而不应当将其看做是一个让被质询者出丑，是与谁过不去的事情。质询也不意味着被质询者的工作出现了严重问题，更不意味着犯了严重错误。其次是降低质询的门槛，降低质询案的立案条件，使一些需要质询的议题能够方便地进入日程。再次，是完善质询的程序，程序要能够保障质询者和被质询者之间的问答，对其中的一些需要进行辩论的问题，应当设立辩论的程序。

## 八 红钻帝国事件与谣言敏感症（1）

济南的一场暴雨，引出了一个在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就是一个社会如何对待舆论，包括不完全真实的传言，抑或谣言。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济南暴雨受灾，传言某商场淹死了人。网络论坛上也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一个网名为红钻帝国的网友，态度激烈地认为肯定有人死了，只不过真相没有公布出来。像很多网友一样，她在回帖中转载了其他网友的现场描述，还引述了自己朋友的说法。有网友问红钻帝国要证据，她说自己没有义务提供证据，只是不相信那些辟谣，并称“我只信我身边朋友对我说的话”。

根据该商场的举报，红钻帝国被治安拘留。拘留的理由为，在某论坛恶意散布谣言，意图在群众中制造恐慌气氛，性质较为恶劣。争议由此而生。

事件发生后，反应敏锐的南方都市报专栏文章就指出，以散布谣言为由抓人，是明显的滥用法律的行为。文章更明确指出，宪法明文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天然包含说错话的自由。文章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比谣言更加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要警惕以制止谣言为名剥夺言论自由。但该文观点马上受

到针锋相对的批驳。批驳的基本理由是，保护言论自由并不是要保护造谣的自由。无论是警方的行动，还是上述的反驳言论，都无例外地强调了这样一个细节：红钻帝国在帖子中明确说，是听朋友的爸爸说淹死了人，而在被拘留之后又承认是自己编造的。

于是问题就引申为，红钻帝国是不是故意造谣，也就是其主观动机问题。辩之者称，红钻帝国并没有造谣的主观故意。其中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帖主是一个在婚纱影楼工作的 23 岁的姑娘，其“红钻帝国”的网名，是在济南暴雨之前就已经注册的，其发表意见主要是在该网站的“漂亮新娘”版块，也就是说参与的是与影楼业务有关的版块。而且即使是在暴雨事件后，“红钻”也没有发过主帖，仅仅是以跟帖形式参与了有关的讨论。评论者指出，一个连主帖都未开过，其所有发言都是以“跟帖”形式出现的普通网民怎么会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而攻之者则认为，对于编造谎言的人，无论如何，他的动机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警方不介入，大家就都可以编造说自己有个什么朋友说过什么话了。

这时候，法律专家的说法就显得权威了。有关报道引用一位法学教授的说法：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应与传播小道消息区分开来，后者不属于违法行为。前者属于结果犯罪，不单单要有基本散布谣言的行为，如果不造成后果，则不违法。造成的客观结果是有具体指标的，比如造成人心惶惶，抢购，秩序混乱，大家不敢出门等等。对于网上发帖的行为，还要看这个帖子有多少人看到，有多大的影响面。比如被广泛转载，就证明大家对这个消息感兴趣，也是衡量社会危害性的指标，

还要看在什么情况下发帖，比如政府已经辟谣，还在发帖，这也是一个衡量指标，不能笼统地看待这一行为。

争论到这里，人们的感觉恐怕还是一头雾水，尤其是在将主观动机这样难以判断的因素扯进来之后，事情就更是无法判断了。也许红钻帝国被拘留是否依法有据的问题，还需要法学家继续争论下去，或许这个事件会成为未来我国讨论相关言论立法时会不断援引的一个经典性案例。但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下几点。

## 八 红钻帝国事件与谣言敏感症（2）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整个争论中，人们几乎很少有直接引用我国的有关法律条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警情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这是人们引用的唯一法律条款。可以注意到的是，这一条款，不仅由于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而显得含糊，而且也将散布谣言和谎报险情等并列，并涉及“故意”这样的主观因素。在讨论我们社会中的一个案例时没有频繁引用我国更为明确的法律条文，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相关法律条文。于是人们就只能引述政治哲学中关于

言论自由的论述、外国的相关法律以及国外发生的类似案例。其中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就引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案例：两年前美国南部发生了卡特里娜飓风悲剧，1500人死亡。刚开始消息混乱，媒体报道中死亡人数高达几万甚至更多。人们迅速将矛头指向布什政府的反应迟钝，救援不力，甚至有人提议弹劾总统。布什总统狼狈不堪，却从来不敢怪罪媒体造谣，更不敢想象警方因为说错死亡数据而抓人。一年以后，还有电视主持人“造谣”说：“今天是卡特里娜一周年，当然，如果从布什总统知道它的时候算起，还有两个月才到……”如果按照上述简单而笼统的法律条款，如何对这个事件进行处罚？

这个现象所表明的，是我国在有关言论或舆论管理上法治化的粗疏。其实，不仅仅是红钻帝国事件，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对许多涉及言论事件的处理，都往往具有同样的特征。拘禁用手机短信针砭时弊的作者时，诽谤领导可以成为“理由”；而制造“纸箱馅包子”假新闻的作者，则是以损害商品声誉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即使制造这种假新闻是有罪的，损害商品声誉罪的罪名也是很勉强的，因为声誉受到损害的，并不是某种具体的商品，而是某个种类的商品。问题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没有成文的新闻法。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因为没有成文的新闻法，譬北佳在实施造假行为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犯罪，在追究其法律责任时，司法机关也还要费尽心机地搜罗罪名。

其次，我们如何对待可能会夹杂失实因素的言论。红钻帝国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除了在我们这个社会如何实现言论自由



这个老问题之外，还在于如下两点。第一，所谓谣言，最近几年中似乎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敏感的问题，而这种敏感性又往往是与频发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在日益普及的互联网上，由于可以匿名发帖，且网络传播的速度快，如何对待以匿名方式发布的消息，尤其是不实或不完全真实的消息，成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谣言”的问题之所以复杂，在于其本身的模糊性。纯粹的谣言，处理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任何国家也都不会容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谣言。但问题是，在现实中，谣言的边界是很难界定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即使是在大体真实的消息中，也会含有不完全真实的因素。这样，当社会取缔了不完全真实的舆论的时候，也就取消了舆论本身。因此，一个社会在用法律的手段制止谣言的时候，如何通过法律保护正常的舆论，包括含有某些不真实成分的舆论，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近些年来反腐败的过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乎所有担任领导职务的腐败分子，在其腐败行为被有关部门查证之前，均没有在媒体上揭露过。换言之，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媒体和公众舆论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但这个问题不能看做是媒体偶然性的失职。

## 八 红钻帝国事件与谣言敏感症（3）

再次，如何界定谣言，如何区分谣言与非谣言的边界，在我们的社会中之所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与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谣言的过分敏感有关，换言之，是我们这个社会在面对谣言时过分脆弱。在特定的情况下，谣言是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比如，在飞机上高喊一声“有炸弹”，或在人多的商场里高喊“失火了”，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倾向并不多见。为什么？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社会对谣言会有一种免疫力。这种免疫力，是由一种正常的舆论生态提供的。在正常的舆论生态中，由于对一件事情可以有多种消息来源，其中一些消息来源，人们根据日常的经验，就知道其具有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判断哪些消息是比较可信的，哪些消息是不太可信的。在这种情况下，谣言很难具有很大的威力，也很难对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而在我们的社会中，谣言之所以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也许就在于缺少一个正常的舆论生态。权力神秘化运作导致的信息匮乏，信息来源单一导致的对信息进行比较的困难，权威性信息来源公信力的下降有时甚至会引起的本能的逆反，都在损害着这种正常的舆论生态，从而使得谣言能够具有杀伤力，并由此在社会生活中处在一种敏感地位。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网络中的谣言和不完全真实信息的传播问题。网络和传统的媒体不一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匿名性，可以匿名发表意见和消息。于是，有人主张要实名制。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倒因为果的做法。人们为什么热衷于用匿名来发表意见？一个基本的原因

是用真名发表意见的条件还很差。但当许多意见或消息的传播都使用匿名的时候，匿名不用负责任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实行实名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相反，如果人们可以较为自由地用实名发表意见或传播消息，人们会更多地选择实名，假如有人突然用匿名发布消息，引来的只能是怀疑，即使其传播的是很有危害性的谣言，其所能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甚至只能成为社会的笑料。

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舆论管理上的法治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早在两年多前我就曾经指出，和谐社会的构建，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因为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有关的政策措施就没有保障。而正常的舆论环境，无疑就是这样的机制之一。在讨论黑砖窑的时候，我的分析也表明，黑砖窑能够长时间相当普遍地存在，是与我们社会中特有的信息屏蔽机制有直接关系的。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当将建设正常的舆论环境看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